

中央研究院
三民主義研究所

專 題 選 刊

(二十三)

先總統 蔣公的治學精神

湯 承 業

中華民國

臺灣 臺北 南港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一月

先總統 蔣公的治學精神

目 錄

前 言	1
第一章 蔣公的國學基礎與學業歷程	2
第二章 天天充實、年年進步	12
第三章 顛沛中亦必讀書	18
第四章 科學的讀書方法	24
第五章 闡發革命哲學	35
第六章 留心時事、每天讀報	45
結 論	53
附 註	54

先總統 蔣公的治學精神

湯承業

前 言

蔣公雖出身於孤貧之農家，但自幼所受之母教與師教，却非常兒可及；蓋其母爲良母、其師爲良師，及長，負笈東瀛，又師之於國父，在其原有的國學基礎之上，又得一大進程。蔣公所異常人之一大特點，即是每天必讀書，每天必充實，從不懈怠，從不間斷；此雖爲人人所易於行者，而尤爲人人所難以行者。至於爲常人所難行者，而爲蔣公所易行者，則是不但於危困之中，能夠讀書不輟；並且愈於危困之中，愈能奮志讀書。蔣公之研究方法，極合邏輯、極合科學，其學與思結合、與學與行結合之讀書精神，固受治於曾國藩，而尤承教於國父。現代戰爭，乃爲思想戰、與學術戰，因之，蔣公治學尤重強化革命理論，闡革命哲學。對於報章雜誌與現代史實，必特加注意，精心研究。總之，蔣公能於深厚的舊學之中，而益之以豐富的新學；復能於力求新學之時，而仍必加強其舊學的進修。所以，蔣公之學、乃是舊中寓新、新中寓舊；唯其如此，故其學業基礎特深，學業進程特速。其爲中國歷代領袖中之最好學者、與最優學者，亦爲世界各國領袖中之最好學者、與最優學者。

第一章 蔣公的國學基礎與學業歷程

(一)

蔣公最景仰孟子之人，最喜愛孟子之書（註一），而王太夫人對蔣公幼年之撫愛與督教，亦恰如孟母之對孟子者然。蔣公曰：

其於中正撫愛之深，常如嬰孩，而督教之嚴，甚於師保。出入必檢其所攜游息必詢其所往，罷讀歸來，必考其所學；而又課以灑掃應對之儀，教以刻苦自立之道，督令躬親備保猥賤之工作，以勵其身心；夜寐夙興，無時不傾注其全力，期撫孤子於成立（註二）。

王太夫人於蔣公之童時，乃以教忠教孝為主，如蔣公曰：

緬懷童時，誦讀孝經，先妣輒爲解忠孝之義曰：「孝者非晨昏定省，奉養無虧之節文而已；乃順意承志、委曲無違之篤行是也」。又曰「以忠蒞事則孝，以敬事長則順，爲國獻身，移孝作忠，乃謂之大孝；故順爲孝之始，而忠爲孝之終」（註三）。

蔣公於「幼年多疾病，且常危篤」之中，竟樂於「誦讀孝經」，可知子者乃非常子；雖然蔣公自謂「六歲就學，頑劣益甚」（註四），而王太夫人竟能教之深明忠孝之義，則知母者尤非常母。

人於童稚之時，無不以好動爲習性者，然而能於動之時而極其動，又能於靜之時而極其靜；如此動靜咸宜、而皆合分際，則殊非易事。蔣公童年時，則能於遊戲時盡情以遊戲，讀書時盡性以讀書，「靜躁如出兩人」。如毛思誠曰：

其（蔣公）戲嬉也，以講舍爲舞臺，以同學爲玩物，狂態不可一世。迨伏案讀書，或握管構思，雖百紛囂然於其側，冥無所覺，一剎那間，靜躁

如出兩人，思誠深異焉（註五）。

案：毛思誠爲 蔣公之師，時 蔣公十六歲，正從思誠「溫習左傳、圈點綱鑑」（註六）；雖然其他學童尚在「紛囂然於其側」，而一心向學之童年 蔣公、竟能「冥無所覺」，則不能不令思誠爲之「深異」。

蔣公雖然常以靜比動爲難（註七），但却能於童年時化動爲靜，「潛心於學業」。如董顯光曰：

少年的 蔣總統完成了鄉鎮學校的課業後，便被送到奉化城裏，攻讀較高級的課程。在鳳麓與龍津兩中學堂內，他（蔣公）似較前此更潛心於學業——無論如何，他使主持考試者無不充分滿意。……往往當其他學生都作無聊的談天，他獨自跑開去，顯然是另行從事於深沉的思考（註八）。

蔣公肄業於龍津學堂時，方十九歲，竟能不作「無聊的談天」，而「從事於深沉的思考」，所以「當時教師對 蔣公皆具深刻印象」（註九）。時董顯光執教於該校，又與 蔣公同住一樓，故能觀察尤爲清晰。如曰：

（蔣）公晨起甚早，盥洗畢，即挺立室前廊下，雙唇緊閉，狀貌堅毅，屹立恒半小時，習以爲常；其恢宏之腦海，究作何思想，固難臆測，然有關於將來之事業，則可斷言（註一〇）。

下課之後，學童皆競相遊戲，而 蔣公則「必往」閱覽室「翻閱報紙」（註一一）。由於「在故鄉學校中所表現的落落寡合」，以致未與「其中任何人構成深切的友誼」；這種沉靜好思的習尚，至日本留學時亦然如此（註一二）。

蔣公此種能靜能思之堅毅性格，固爲天賦之資，似亦有得之於母教者。如 蔣公曰：

先妣於楞嚴、維摩、金剛、觀音諸經，皆能背誦註釋，尤復深明宗派。中正回里時，先妣必爲之諄諄講解，教授精詳（註一三）。

案：蔣公獲育於儒教，當然深邃定、靜、安、慮、得之要義（註一四）；又受治

於佛教，則必然能淨其心而澄其慮以聚精會神而致力思考矣。人之學業志業往往可以決定終身之事業，所以陳啓天「讀 蔣公介石五十生日感言，始知其生平志業得力於母教者，至深且大」（註一五）。

(二)

王太夫人極重 蔣公之學，而 蔣公又極能致力於學，所以其雖然生長於「閉塞的鄉間，不足以阻撓他的銳氣」（註一六）。此一篤志好學的「銳氣」，使 蔣公自幼受到中國道統之薰陶，而奠定其國學之根基。八歲，從蔣謹藩讀大學、中庸，並讀「神童詩」；九歲，從任介眉讀論語、孟子，又從蔣謹藩讀禮記、千家詩；十歲，讀孝經與三才略；十一歲，讀春秋左傳與唐詩三百首；十二歲，讀詩經，間習古文辭、學作制藝；十三歲，從姚宗元讀尚書（唐詩三百首讀完）；十四歲，從毛鳳美讀易經；十五歲，從竺景松讀左傳卒業，始學作策論；十六歲，從毛思誠溫習左傳，圈點綱鑑；十七歲，始入邑城鳳麓學堂，習英文、算術，受新式教育。是時學校課目，仍重經史，總教習竺慶祥（清翰林）主講禮記、歷史，周鳳祺主講周禮；十八歲，仍肄業於鳳麓學堂，鄒珍任總教習；十九歲顧清廉（葆性）講學於箭金學堂，公從之遊，讀周秦諸子、說文解字及曾文正集，並研究性理之學，且講述民族大義；二十歲，入邑城龍津中學堂，江起鯤為總教習，毛思誠任監學，公因受內外潮流之激盪，感痛國族之陵夷，家族之貧弱，在校未三月，即決計出洋，立志革命（註一七）。蔣謹藩先生於授 公國學之外，並兼授美國史，對 公啓迪頗多（註一八）。惟對 公影響尤深者則為顧清廉先生。如孫詒述曰：

顧氏為鄞大師，生清之季世，嘗游學日本，歸而無所遇，益厲於學，以貧窶教授生徙終其身；讀書博聞強識，凡經學、小學、名、法、兵、醫諸家言，無不曉習。言性理必兼經世，平生服膺湘鄉曾氏，勸生徙多看曾文正公家書，謂此書詞淺顯而意深長，情篤摯而理平實，於初學甚有裨益云。其教人必明以為學之塗轍，及變化其人之氣質。察（蔣）公器識異等，

日課外又以周秦諸子、說文、及曾文正書授之，並特勗之讀孫子。平居好談革命及時政得失，常稱道總理，謂中國革命黨魁 孫某如何如何公聞之神馳（註一九）。

案：由於蔣公對革命之嚮心，對國父之神馳，所以二十歲到日本，認識陳其美（英士）二十二歲入日本振武學校，由陳氏介紹入同盟會；二十四歲晉見國父，極蒙賞識（註二〇）。

易經乃為高深之人生哲理，少年人原不易領會，故孔子曾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註二一）！然而蔣公既有良師良母，自己又能思能學，故於十四歲學易時，即能心領神會、而為之變化氣質；吾師高仲華先生對此曾為研究，並就蔣公改名取字一事，為之論證曰：

蔣總統原名瑞元，譜名周秦，學名志清。大概在十四歲讀易之後，纔改名中正，字介石。周易豫卦六二爻辭說：「介于石，不終日，貞吉」。這一爻的象傳說：「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這是蔣總統名、字的出處（註二二）。

由此事實證明，蔣公幼時之治學，的確能消化、能吸收；以如此睿智之青年學子，當然容易在考場上取勝。案：蔣公雖於二十歲（一九〇六）東渡日本，但未能達成留學之願、而又折回，因為「當時日本的規定，中國學生要入日本軍隊受訓，必須由中國陸軍部保送，否則概不收容」。所以蔣公說：「我既非政府保送，自然不能入伍，因此我只在日本留學一年就回國了」（註二三）。於是乃憑其深厚之學業基礎，投身於留學考試，如蔣公曰：

到了第二年（一九〇七），陸軍部要在保定創立通國陸軍速成學堂，在各省分別招考，規定每省考選四十名。而浙江省的四十名，大多數的名額已由武備學堂與弁目學堂等處保送了，所留餘額只有十四名，全省青年千餘人在杭州報名投考，我就是在這十四名額內考取的一個學生，於是我在二十歲的夏季，就進了保定通國陸軍速成學堂（註二四）。

通過浙江省的此次選拔考試，確需憑其真才實學，因為在五場考試中，蔣公每次都得名耀榜上；黎東方爲此曾親訪姚琮（味辛），茲錄述其文於次：

浙江省的名額是四十名，但其中二十八名，據姚琮（味辛）先生說，已經規定由浙江武備學堂、隨營學堂、及弁名學堂保送，只剩下十二名公開招考。報考的人，有一千七百餘人之多。一共考了五場，每考一場放一次榜，淘汰去一些學生。蔣公與姚先生場場考得好，每一次榜上都有他們兩人的名字（註二五）。

在保定軍校又經過留學考試與日文考試等關口，才成爲被錄取的四十名留日學生之一，於是蔣公「被保送到（日本）振武學校，這時已二十一歲了」（註二六）。

蔣公由二十一歲至二十五歲（一九〇七至一九一一），雖在日本專習軍事，然而其學業基礎與範圍，絕非軍事之可囿可限，若依其學業之蘊積與進程而論之，則六歲至十六歲，可稱爲學業基礎之第一期，此一期爲接受中國道統教育之時；十七歲至二十五歲爲第二期，由舊式家塾教育進入新式學校教育，此一期之學業中心爲科學與軍事；二十六歲至四十歲爲第三期，乃在革命報國中從事進修，已達融滙中西學術之成熟階段；其事業益進，其學業益勤，可以說年有常業，日有常課。此一時期蔣公所讀的書籍，每年不下數十百種，範圍極爲廣泛，包括各種中西學術名著（註二七）。茲將蔣公三十八歲時，手定常閱之書目抄錄於次，以見其治學之績業：

五經	資治通鑑
左傳	普法戰史
孫子	歐戰史
韓非子	巴爾克戰術
漢書	世界地理
西洋史	岳武穆集
日俄戰史	曾國藩全集

戰時正義	駱秉章全集
亞洲地理	中國哲學史
諸葛武侯集	經濟學
戚武毅叢書	孔子家語
左宗棠全集	六韜
樊山批牘	莊子
統計學	史記
四子書	清史輯覽
戰國策	拿氏戰史
吳子	各種軍事學
管子	中國地理
離騷	古文辭類纂
文文山全集	心理學
胡林翼全集	社會學（註二八）
李鴻章全集	

案：蔣公三十八歲時，正主持黃埔軍官學校，並兼任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粵軍總司令部訓練部長、長洲要塞司令、軍事委員會委員，襄助國父策劃北伐事宜，當時可謂最忙之人；而其經常閱讀之書籍則如上列，其治學之勤、與積學之厚，則可想而知矣。

蔣公不獨於三十八歲時有此讀書績業，乃是每年如此、終生如此，誠如王昇所說：「總統蔣公從二十五歲到今天，五十多年如一日，從沒有一天不讀書的」（註二九）。由於其「五十多年如一日的精勤研讀」，所以我們必須確知與確信「總統蔣公更是一位學者」（註三〇）。

蔣公之讀書，最能持之以恆，於四十七歲時，猶在南昌行營對全軍將校公開宣稱：「我至今每時每刻不敢忘了學問」（註三一）。並且以此勉勵部屬「注重學問，力求上進」（註三二）。蔣公認為曾國藩所以能夠平定洪楊之亂，就是由於讀書求得的學問，以致增進智慧，化爲力量。如曰：

曾文正畢竟能夠轉弱爲強，轉敗爲勝，打破困苦的環境，消滅頑強的敵人。他之所以能夠成功，並沒有旁的秘訣，就是他肯學習、肯研究，不惜虛己下人，不吝隨時請益（註三三）。

所以蔣公最贊揚曾國藩精神，最樂讀曾國藩文集，因能變化氣質，受益良多（註三四），故特囑經國先生自幼熟讀曾氏家訓（註三五）；有時因公務特忙，無暇爲子復信，乃指定曾氏家訓之篇目，令之熟讀，以代復信。如經國先生曰：

平常我寫信去請安，父親因爲事忙，有時來不及詳細答覆，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訓第幾篇代替回信，要我細細去參閱（註三六）。

案：由此一事，則知蔣公對曾文正公全集讀得何等精熟、何等透闢！

其實蔣公不獨對曾氏文集精讀熟讀，乃主張「凡百學問，總要熟練了以後，方可應付」（註三七）。如曰：

我從前少年時候，先生教我讀大學，總背誦過兩三百遍。到了十七八歲的時候，我以爲大學裏面所講的都是陳舊的東西，因此就把他攔了，不再讀他。一直到二十八歲的時候，總理對我講大學之道，才恍然大悟，知道這是一部最有價值的政治哲學（註三六）。

案：蔣公幼時對大學一書「背誦兩三百遍」，則其恒毅之精神於此俱見。自謂「幼讀聖賢之書，長隸革命之籍」（註三七）。誠然，唯有真得聖賢之旨，始能真作革命之士。

(四)

蔣公留日之苦學精神，較之范文正公發憤於長白山醴泉寺時之情景，誠有過之

而無不及(註三八)。二十四歲，卒業於振武學校(一九一〇)，乃升入日本高田野砲兵第十三聯隊，爲士官候補生，此時之生活，乃是鋼鐵之生活，此中之紀律，乃是鋼鐵之紀律。如毛思誠述曰：

其時天氣沍寒，雪深丈餘，朝操刷馬，夕歸刮靴，苦役一如新兵。(蔣公)嘗奮然曰：「將來戰場生活其苦楚當不止如今日而已，是固尋常，有何難耐者」。故齧定牙根，事事爭先，不自感覺其苦。而日本兵營階級之嚴，待下之虐，與營內之整潔，皆於此親見之(註三九)。

日本軍營中不合理之事誠多，軍官之對士兵(甚至老兵對新兵)，「想打就打，想罵就罵」；蔣公爲了學習軍事以參加革命，總是「咬緊牙關推了下去」(註四〇)。在常人則以此爲苦，而蔣公則認爲此乃「平生最大的學業」，常樂道之，如曰：

但無論他天氣如何寒冷，無論他雪下得怎樣大，我們每天早晨五點鐘以前就得起床，起床以後，就得自己拿着面盆，到井旁提冷水來洗臉。因爲在砲兵聯隊裏學砲兵，都要你自己來養馬，因此，我們洗了臉之後，官長就帶領我們進到馬廄去擦馬，擦馬的工作，要從馬蹄、馬腿擦到馬背，經過馬背擦到馬頭、馬尾，這馬的每一個關節，每一部肌肉，都要用禾草來盡力的擦摩，這樣大概經過一小時，將馬的渾身擦熱了，馬的血脈流通了，而我們本身亦因爲用勁擦馬，努力工作，雖在這樣冷天，不僅不覺得寒凍，而且身上和手足都是發熱，有時候，還要流汗。這是我平生最大的學業(註四一)。

直到蔣公作了全國最高統帥，每每憶之，「仍覺得以苦爲樂」(註四二)。

在日本學軍事，已是相當緊張、相當艱苦，但蔣公仍不疏忽在另一方面力求充實，譬如鄭所南之「心史」、與鄭容之「革命軍」等書，皆爲留日時喜愛的讀物，而且「晨夕披覽不息」(註四三)。並且既效法了日本的力行精神，又發揚了中國的力行精神，如蔣公曰：

當我早年留學日本的時候，不論在火車上電車上，或在輪渡上，凡是在旅行的時候，總看到許多日本人都在閱讀王陽明傳習錄，且有很多人讀了之後，就閉目靜坐，似乎是在聚精會神，思索這個哲學的精義；特別是他陸海軍官，對於陽明哲學，更是手不釋卷的在那裏拳服膺。後來到書坊去買書，發現關於王陽明一類的書籍很多，有些還是我們國內所見不到的，我於是將陽明哲學有關的各種書籍，盡我所有的財力都買了來（註四四）。可知 蔣公之留日，固為學其軍事，尤為學其哲學；此固需超人的毅力，尤需超人見識。

(五)

蔣公幼年時，因受張之洞所撰「勸學篇」傳述之激盪，其早已懷有一種信念：「假使中國要恢復其權力與聲望，西式的教育將是很重要的」（註四五）。所以在亥革命（一九一一）成功之後，乃復往日本留學，如其致顧乃斌書曰：

破壞已畢，建設方始，自知才力不逮，因東遊以就舊業，足下加我以功成不居之名，聞之愈不自安也（註四六）。

蔣公擬由日本再赴德國，所以「在日專習德文，為留學德國預備」（註四七）。

此一留德之志願，因遵從 國父之命參加二次革命而未果其行。如黎東方述曰：

當德文德語學得有相當程度，於民國二年春天回國，即將轉往德國之時，他（蔣公）在上海謁見 國父，第一次與 國父單獨深談。國父命令他打消去德國的念頭，留他在國內從事討袁工作（註四八）。

蔣公為責任所在，不容出國，但一直在為留學之準備工作而努力，除通習日、德二國語文之外，並且勤讀英文、俄文，「預備留學」（註四九）。

蔣公雖然力讀四國語文，準備留學，儲為大用，無奈苦難的國家始終繫留 蔣公，使其無法去國一步，譬如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公第一次「下野」，擬將「以五年時間遊歷西方各國」；並決定「先至美國，研究政治經濟及戰術」（註五

○)。但 蔣公隱退後，僅得到四個多月的清閑日子，誠如當時外國記者所云：「蔣將軍本欲暫時忘懷於國事軍事者，卻不可得」（註五一）。因為「天天有若干人寫信或打電報給他（蔣公），有若干人到雪竇寺來，向他請示」（註五二）。其所以如此，正如黎東方所云：

他（蔣公）不僅曾經是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有幾十萬軍官與士兵作過他的部下、而仍舊對他愛戴；他而且是中國國民黨全黨的一位中堅人物，一位其介如石，堅強得令人信賴、令人仰望的人物；同時也是全中國任何一個軍、任何一個黨、任何一個地區，所找不出來的，富有統馭才能、以國家利益為前提的領袖（註五三）。

在國家需要 蔣公、軍民需要 蔣公的情形下，其只得放棄留學計劃，繼續擔負起領導國家與軍民的重任。

蔣公雖然遵照 國父命令、與繼承 國父意志，而未能實現其留學歐美的意願，但其追隨 國父、與師事 國父，誠已盡得 國父之所學；所得之進益，絕非留學於任何國家所可比擬者。如 蔣公曰：

中正海隅下土，未嘗學問，得聞大義，追隨革命，胥出我 總理教誨栽培之所賜（註五四）。

由於 蔣公受教於 國父愈久，則得道愈深，而其對 國父亦愈景仰、愈愛慕。如毛思誠述曰：

（民國八年三月二十三日），（蔣）公謁辭 總理領訓。移時出語人曰：「吾 師思想之偉大，受教彌久，慕道益篤，乃知更非儕輩所能仰希萬一也」（註五五）。

誠然，蔣公「自幼年時代，即已參加革命組織」；「在人生可塑性最豐富的時期，始終不曾離開革命事業」；簡而言之，「其教育其思想可說一手由 孫中山先生所陶鑄」（註五六）。讀過 蔣公「國父遺教概要」（註五七）、及「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註五八）等著作，則可深知 國父陶鑄 蔣公之深，與 蔣公鑽仰

國父之誠。如 蔣公於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函示經國先生曰：「爾現在不必看自反錄，應急看孫文學說與三民主義原文，蓋我之思想與言行，皆本於總理之哲學也」（註五九）。此乃傳心之言，此亦寫心之言。

第二章 天天充實、年年進步

(一)

細讀毛思誠著「民國十五年以前之 蔣介石先生」一書，其中大部分內容為蔣公治學與誨人者，誠如王雲五說：「總統 蔣公生前博覽羣籍，最大的嗜好是讀書，他也時常勉勵青年及幹部讀書」（註六〇）。譬如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十月二日，在南昌行營訓示部將曰：

大家要努力不懈、繼續不斷的研究學問，改造軍隊，革新政治，充實國力，準備參加未來的國際戰爭，開闢我們革命的前途（註六一）。

案：推求 蔣公之意，「充實國力」之基本要件，為「改造軍隊」與「革新政治」，而「改造軍隊」與「革新政治」之主要前提，在於「努力不懈」與「繼續不斷」的「研究學問」。可見「研究學問」與「充實國力」之關係、何等密切；換言之，斷無軍政負責人不「研究學問」、而可以「充實國力」者。蔣公重視「研究學問」之要義在此，而其治學與誨人者，則為「努力不懈」與「繼續不斷」。明乎此，則知毛子水贊揚 蔣公為中國歷代政治領袖最勤學的一位（註六二）；確為肺腑之言。

由於「時代進步，政務日繁」，所以「現代國家負實際政治責任的領導者都很忙碌」。而 蔣公生前又要時刻「盡籌碩劃」着「如何早日完成反攻復國」，所以其「更比他國元首為辛勤和繁忙」（註六三）。雖然為盡瘁於國事而甚為「辛勤」與「繁忙」，但 蔣公對於治學，總是「努力不懈」與「繼續不斷」。如顧維鈞說：

蔣公終日惕勵，日夜不息的自修精神，不論在軍務倥傯之際，或者日理萬

機之餘，蔣總統都會抽出時間來讀書寫字，充實自己（註六四）。

案：蔣公不獨自訂每年必讀之要籍目錄（註六五）。並且按月按日自訂進度表（註六六）。因為蔣公有一基本信念，則是「今天不知，明天再學；今年不能，明年再做」（註六七）。天天充實，年年進步，絕不容許有一日空白、一日間隔。所以蔣公既以此而自勉，又以此而勉人；更要求其部屬、而以此勉其部屬。如曰：

古人說：「開卷有益」，歷來成大功立大業的人，無不是「手不釋卷」，所以我們除非自甘暴棄則已，否則必須從此努力看書，研究學術，不僅自己要如此，而且要督促部下，也應注重學問，努力研究（註六八）。

案：蔣公確信「開卷有益」，所以必能「手不釋卷」。

(二)

蔣公好學之精神，固為自所養成，亦為受誨於國父者，如蔣公曰：

總理對於中國的經史子集，都是很有研究的，他叫人對於古人經書每年總要看一遍才好；故我於每年之初必看經書，當然看得很熟。但是這種古書，不到相當的年齡，有相當的經驗程度，必不能感到它的真有價值，尤其不知道它對於我們的國家以及我們個人德業的重要（註六九）。

可見蔣公初讀經書時，亦不會覺得其「真有價值」的重要性，但仍然持之以恆，每年必讀，及至「看得很熟」，又到「相當年齡」，自然覺得其為治國之寶典、與治人之常經。

國父之讀書精神，對蔣公亦頗多影響，國父雖注意最新學說，但尤注重最古典籍。如蔣公曰：

我們總理真是博古通今，凡屬中西重要書籍，他都看過，無論何國出版的新書，一經出版，不到三個月，就必在他的圖書裏擺着，無論什麼新書，他一定是要買來研究的。可知總理對於歐美各種學說，並不是不注重的，他是很注重外國東西的。但他一講到大學中庸的政治倫理哲學時，他

就說，外國一切的政治學說，都不能超過我們固有的大學中庸之道（註七〇）。

能夠通經，自然能夠達變，在蔣公到「相當年齡」與「相當程度」之後，國父則「恒對（蔣）公縱談歷代之興亡得失」，而蔣公之對國父「則師事彌篤矣」（註七一）。

蔣公對國父之學，乃好之彌篤，鑽之彌勤，此種彌篤彌勤之情形，在國父逝世之後，則為愈堅愈勵。茲舉蔣公二則論述於次：

以前我對於總理學說與陽明哲學不能符合之點，求之於心總有不安，又因總理逝世太早，使我無從質疑，後來費了許多時間，才獲得以上的結論（註七二）。

後來我們東征、北伐，深知非徹底痛抉出此一深入膏肓的病痛之根、耻辱之根不可，因殫思竭慮，寢饋夢寐於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久乃豁然貫通，以為唯此足以輔益總理知難行易學說，使人無所畏而樂於行，而這亦就是我研究革命哲學之經過，與提倡力學哲學的由來（註七三）。

蔣公之師事國父之人與鑽研國父之學，誠屬已達「學者學此樂，樂者樂此學」之境界（註七四）。正因其師事國父如此之誠、與鑽研國父如此之精，故於訓詞中經常引述國父之語句，既中肯、又恰切（註七五）。總之，蔣公之對古聖、對國父，乃是鑽之以「矻矻窮年」，研之以「層層進取」，務願「以期能識其全」（註七六）；故曰：「蔣公以一身兼為學人、通人、仁人、哲人，謂為今之聖人，當為舉世之所公認」（註七七）。

(三)

曾約農說：他每次晉見蔣公，「蔣公都是剛把書放離開手」；並說：「有次發現蔣公在鄰室背誦唐詩，不僅誦得極熟，且極有韻味」（註七八）。蔣公「與國父一樣，無日不在好學深思研究實踐中；他不但是夙夜精勤，手不釋卷，

，即在旅行中，也是載書自隨」（註七九）。如張其昀述曰：

記得民國三十八年，本人追隨 總統到菲律賓舉行碧瑤會議，在飛機上我們坐在後排休息，他坐在前排看書，並且用筆來劃線。有時候他到中南部高雄等處，常有電話給本人，需立即把那些書送往，近二十多年來，本人監修或主持譯述的書籍，很多是奉着他的意志而做的（註八〇）。

可知 蔣公偶而外出旅行，乃並非「到外地去休假，（而）是用苦功去寫書的」（註八一）。

熊凡為隨侍 蔣公最久的醫生，知之最切，他說：「蔣公無一日不讀書，寫日記的習慣也保持終生」（註八二）。蔣公曾說：「國父一生只要一日不看書，即皇皇如有所失」；故曰：「首先我們要效法的，是國父的好學不倦的精神」（註八三）。爲了求充實、求進步，蔣公絕對不容許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中之任何一日，輕易過去與隨便過去（註八四）。雖然日間工作已經極忙，夜間總是「看書後睡」（註八五）。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引退還鄉，一月三十日上午往寧波城內金紫廟祭祖，又回溪口親赴宗祠及大、二、三、四各房祖堂祭祖，此乃相當緊湊的半日時光，但下午仍在慈奄讀書（註八六）。蔣公之此一精神，錢賓四師極爲贊佩，如曰：

我 蔣總統在其出而擔負國家重任五十年中，戎馬倥傯，軍事叢脞，迄未有寧。然而始終不廢讀書，兼及著述，其所讀所述，一皆我中華民族傳統精旨所係。其好學不倦之精神，求之古今中外一國元首，能相媲美者，殆已少之尤少，亦可謂除 中山先生外，乃絕無其匹（註八七）。

案：於「戎馬倥傯，軍事叢脞」中，而能讀書不輟，且能吸取其中之「精旨」而著述之，此確爲 蔣公不可及之偉大屬。

(四)

蔣公召示我們說：現代戰爭乃是「打思想、打學術、打人才」的戰爭（註八八

）。而欲求得現代戰爭之勝利，則必須發奮讀書，力求充實，所以 蔣公 總序「歷代名將言行錄」曰：「哲人日遠，其載之嘉言，見之行事者，獨勸學可以至之」（註八九）。又於「歷代名將傳」之序文中曰：「趨時發憤，力爭俄頃，師法古人，進學成德。蓋此日涵濡之效，即明日功烈之基也」（註九〇）。論及幹部之「素質學問」蔣公 曾慨嘆言之曰：

現在中國軍隊最大的缺點，就在官長的素質學問太差，尤其是缺乏現代的常識，這種現象，越到上級越是顯著，所以上級幹部不如中級幹部，中級幹部不如下級幹部（註九一）。

因之，剴切曉諭「中級以上的軍官，應該知道哲學的重要，每天或每星期總要抽出若干時間來不斷研究」（註九二）。

蔣公 主張愈是高級將領，愈應隨身攜帶必備的「基本書籍」，隨時閱讀，隨時研究（註九三）。並主張將各人之心得與感受，「彼此交換意見，互相討論，隨時發現缺點，隨時注意改進」（註九四）。茲舉 蔣公 於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對中央黨務學校學生的一段訓詞於次：

所以現在大家不但要研究建國大綱，而且要時時刻刻不忘却了建國大綱。

不但要口誦心維，反覆研究，簡直要隨身攜帶，隨時記取（註九五）。

因為 蔣公 主張所有之幹部與學生、都應有「隨身攜帶，隨時記取」的讀書習慣、與研究精神，所以特別指示革命實踐研究院將編印的書籍，「最好能擺在口袋裏」（註九六）。景效 蔣公 的勤學精神，追懷 蔣公 的勸學訓誨，我們真應該「含淚讀書」（註九七）。

(五)

蔣公 經常邀請學者專家，依照預開科目，作系統演講，虛心聽取之，故羅家倫 說：「從學問講，蔣先生 是最好學最不耻下問的人」（註九八）。就是長公子經國先生 之著述，蔣公 亦留神批閱，吸取其中之聞見；如經國先生 曰：

父親在生之日，閱我寫「去國十二年」一冊，其中詳述留俄十二年備受精神與體力折磨之種種經過。父親對此報告，批閱四次之多，曾囑妥爲保存（註九九）。

案：對於後輩著述竟批閱四次之多，蔣公好學之篤，此又爲事證之一。

「俄共的歪曲理論和其充滿獸性的鬭爭行爲，固是以其『唯物辯證法』爲唯一根據；就是俄寇的戰略戰術思想，也無不以其『唯物辯證法』爲淵源，而推演敷陳出來的」（註一〇〇）。因爲「共產主義的始祖馬克斯，却剽竊了黑格爾研究歷史發展的法則，盡量予以曲解與利用，來完成其所謂『唯物辯證法』的謬論」（註一〇一）。所以蔣公以恒毅的決心，將黑格爾哲學徹底研究過。如曰：

三十年來，我對於黑格爾辯證法的研究，可以說始終不曾放手過（註一〇二）。

以三十年的努力，終於得出結論：「與其說黑格爾是唯物論者，毋寧說其是唯心論者較爲適當」（註一〇三）。案：對一問題鏗而不舍的研究三十年，此更爲蔣公篤學的事證之一。可見蔣公天天在研究、天天在進步（註一〇四）。

蔣公最惡學問與人生脫節，亦與政治脫節（註一〇五）；基於「不以己欲爲欲，而以衆心爲心」之哲理（註一〇六），蔣公最注意深入民間，探求民意；經國先生兩句自勉的話：「老百姓就是我的老師，農場工廠就是我的教室」（註一〇七），想必極得蔣公的嘉納。其虛懷若谷的偉大風範，實爲好學之誠所陶鑄的表徵，「每逢到晉見的貴客，如果講述什麼，蔣總統必悉心諦聽，有時發現說的人確有創見和新知，就還要筆記下來」（註一〇八）。至於由國外考察回來的軍政人員，當其報告所學所感時，蔣公必然蒞場聽取之；在重要關鍵處，「還要不厭其詳的查問明白」（註一〇九）。總之，蔣公閱讀過、批註過、圈點過的許多書籍，固爲留給我們的「有形遺產」（註一一〇），而其好學求知的恒心毅力，則爲留給我們的「無形遺產」。譬如蔣公以三十年之工力研究黑格爾，「發現馬克斯完全倒果爲因，只是竊取了黑格爾辯證法的外殼」（註一一一）。此不但增強了反共戰

爭的精神武力，更對學術思想爲一大貢獻，所以曹聖芬說：

從前北京大學一位哲學教授賀麟先生曾經說過：「德國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最是晦澁難懂，中國哲學家對之真有深刻研究、真能透徹瞭解的只有少數幾位，而 總統是其中之一（註一一二）。

案：此話出自北京大學哲學教授賀麟之口，則 蔣公之哲學造詣可知矣。所以，蔣公固爲政治領袖，亦爲學術領袖。

第三章 顛沛中亦必讀書

(一)

蔣公一生都在「處變慎謀」的環境中奮勇前進（註一一三），所以印度尼赫魯贊揚 蔣公的勇氣與決心爲「永不動搖」者（註一一四）。誠然，蔣公自勵的箴言是：「不怕困難，克服困難；不怕危險，衝破危險」（註一一五）。每逢「遇到極危險困難的時候，祇是平平常常誠誠實實的照天理人情做去」（註一一六）。其深以「一切事業皆出於我們的精神，而真的精神又必出於我們的學問」（註一一七）。所以不管處境如何困難與危險，絕不間斷其讀書與研究，「一年有一年的計畫，一日有一日的進度」（註一一八）。蔣公認爲軍隊就是最完善的學府，有其最寶貴的學問；如曰：

由於我四十年軍隊生活的經驗，使我覺得從軍殺敵不但是革命報國的一條正路，而且我覺得軍事的知識和技術，是一種最高尚、最寶貴的學問和技術，尤其是軍事組織，更是一切組織的最高範型（註一一九）。

所以 蔣公不但留心軍隊之事事物物、而注意研究之，並且在戰爭中熟讀兵書，其心得最多、效果極佳，例如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在永泰戰役中，就曾研讀「巴爾克戰術」與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等書（註一二〇）；可惜當 蔣公於「隻身突圍而出時」，「凡歷來所好及手所評閱各書籍與日記等，均於是役遺失」（註一二一）。

(二)

戰爭勝利之後，固必讀書，失敗之後，尤必讀書；且失敗後讀書、較之勝利後讀書，又可增多一種心得、增高一層體會。茲將民國二年（一九一三）討袁戰爭失敗後，蔣公之讀書心得與體會，摘述於次：

洎乎民國二年失敗以後，再將曾氏之書與胡左諸集，悉心研究，不禁而歎胡潤之之才略識見，與左季高之志氣節操，高出一世，實不愧為當時名將，由是益知其事業成敗，實有所本也。夫滿清之所以中興，太平天國之所以失敗者，蓋非人才消長之故，而實德業隆替之徵也。彼洪楊石李陳韋之才略，豈不能比擬於曾胡左李之清季？然而曾氏標榜道德，力體躬行，以為一世倡，其結果竟能變易風俗，挽回頹靡（註一二二）。

明乎此，則知抗戰之前 蔣公所以提倡新生活運動，反攻之前 蔣公之所以倡導文化復興運動；且在任何時期、始終以四維八德為天下倡之意義矣。

尤其於失敗之後、其讀書之心情與志節亦不同於尋常，茲將民國四年（一九一五）蔣公二十九歲時，在日本之讀書情況，摘述於次：

公比年遜迹東京，銳志於學，每日朝夕靜坐，看書、習字皆有常課。尤喜讀王陽明、曾文正、胡文忠三集，手未暫釋。前在陸軍學校所受課程秘本，與巴爾克戰術書，靡不逐一精研。軍事學即以巴爾克戰術書為基礎，而政治學則以儒家聖聖相傳之精義，與王陽明、曾文正二集為根據也（註一二三）。

案：以二十九歲之青年，竟能「朝夕靜坐」、而「銳志於學」，則為 蔣公之超凡處與脫俗處。又如民國七年（一九一八）革命又進於低潮之時，蔣公則「蟄居滬壩，時有戒心，惟以讀書自遣」（註一二四）。蔣公領導革命軍東征討逆期間，誠屬身在軍事旁午之中，但仍然讀書不輟，所讀者有宋鑑、元鑑、明鑑、防海紀略、平浙紀略、定夷叢刊、太平天國外略，胡文忠書牘、中國哲學史、天演論、地形學、蒲魯美戰略論、室少佐著初級戰術、西洋通史、林譯拿破崙本紀、原則之應用、參謀要務等書，及讀莊子、經史百家雜鈔簡編與英文（註一二五）。至於修心養性之道及所讀之書，據毛思誠所述，摘錄於次：

公頻年夜坐習靜，默念執持者，有孟子養氣章、曾文正主靜箴、赫赫穆穆之條、研幾之條、一陽初動萬物資始之條、靈明無著之條。至是歲（案：民國七年）則增王陽明萬象森然冲漠無朕之條（註一二六）。

綜上以觀，則知 蔣公雖處戎馬倥傯之中，不獨依然讀書有程，並且進德與修業，兩不偏頗。

(三)

經國先生述明朝大儒高攀龍之語曰：「人生處順境好過、卻險，處逆境難過、卻穩」（註一二七）。引伸而言之，此即「處變不驚」之義，亦即應以處順境之心情以處逆境，以處逆境之心情而處順境。蔣公為孝心最篤之高士、孝性最醇之大儒，其喪母之痛，應屬人生大變故、應為人生大逆境，然在居喪期間，仍然藉讀書以節哀自慰。如毛思誠述曰：

……及居王太夫人喪，讀禮記，八月後，誦詩經、溫選本文，習英語。九月中旬起，看交戰及統帥學（註一二八）。

案：蔣公所以能夠以處順境之心情而處逆境，以處逆境之心情而處順境，蓋亦有

其自處之道，如曰：「欲使此心不紛亂，惟有依程序做事，循課表讀書而已」（註一二九）。

就是因爲 蔣公能使「此心不紛亂」，所以能在危難與緊張之中，仍然「依程序做事，循課表讀書」；亦正因其能於任何時期，仍然「依程序做事，循課表讀書」，所以可在任何時期使「此心不紛亂」。家喪時期，蔣公固然「循課表讀書」，國喪時期，亦復如之，如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三月 國父逝世後，蔣公於同月三十日上午率領將士追悼與公祭之後，下午則「如潮汕，由西門外下船，船中披覽理學」（註一三〇）。在船中固必讀書，在車中尤必讀書（註一三一）；誠然，蔣公之讀書精神，乃是「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註一三二）。

(四)

蔣公不但每日必讀書，並且對於「好書和有用的書、則百讀不厭」（註一三三）的確，蔣公之於同一書籍，因愛之而常讀數遍。如唐振楚述曰：

總裁自幼以至現在，未嘗一日廢學，自稱他的學問，「都是就中國古來大思想家的重要著作、從頭至尾看一遍或三五遍得來」（註一三四）。

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的「西安事變」，不獨爲國家民族的存亡關頭，亦爲 蔣公的生死邊緣；但 蔣公「在西安事變期內，猶不時閱讀墨子」（註一三五）。而此時讀墨子、乃是在事變負傷後之「劇痛」中所讀者，此又爲出乎常人之所能。如 蔣公於十二月十九日記曰：

昨日以前，上身骨節痛疼難受，今日則臀部亦作劇痛，幾不能起坐。看墨子完（註一三六）。

案：雖在「劇痛」之中，猶必將墨子「看完」，此不獨發揚了古聖先賢的浩然正氣，並亦代表了中華民族的堅毅精神。

蔣公自束髮追隨 國父革命以來，即「無時不以耶穌基督與 總理信徒自居」（蔣公遺囑）。若就 蔣公「學貫天人」的化境言之，其生活之一面雖屬地，而生命之一面却屬天；換言之，蔣公的革命救國事業，乃是替天行道、對天負責。以如此之心境而致志於革命事業，當然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時之懼。亦即惟憂國之存亡與民之福禍，不懼己之得失與身之生死。惟有如此之至仁者，才能於大變中照常讀書，以求充實而儲為大用。如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蔣公飛訪印度之返國途中，遭到日本飛機之「追擊」，蔣公自以生命擊之於天，充實課之於己，仍然「照常看書，從容自若」。俞國華為同機的隨員之一，因述其事曰：

離臘返國，總統座機受到十八架日本飛機追擊，接獲情報，大家紛紛揹上降落傘，以備應變，蔣公經大家勸請，才也揹上降落傘，但仍然常看書，從容自若（註一三七）。

案：面對如此之險難時刻，而猶能鎮靜如素，豈止「過人」是已，正為「超人」是也。復案：蔣公之力求充實者、即為「以國家興亡為己任」，而蔣公之臨危不驚者、即為「置個人死生於度外」（蔣公病中手書墨寶）。

(五)

抗戰期間，蔣公真是日理萬機，緊迫萬分，但其每天仍必讀書；如唐振楚述曰：

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抗戰的軍事外交萬分緊迫，而 總裁每日讀宋元學案從未間斷，細圈密點，眉批燦然（註一三八）。

案：「宋元學案」此書，蔣公「小時已讀過，抗戰時又再讀」（註一三九）；當時雖然「軍事緊急」，但 蔣公「每天必抽幾分鐘看宋元學案」（註一四〇）。僅就此而論之，則此一領袖所領導之戰爭、必是勝利的戰爭，且此一領袖所代表之民族、亦必是勝利的民族。

蔣公尤其令人非常企羨、與由衷景仰者，即是戰局愈緊張、則其讀書愈從容，

戰事愈危急、則讀書愈鎮定。如陶希聖述曰：

每逢戰局緊張甚至危急的時候，總裁必手諭我等從圖書館或書店提出幾種書籍呈閱。我們也就從總裁要書看這一點，推測戰局的緊張或危急。

我們知道軍事愈為緊急，總裁愈是從容與鎮定（註一四一）。

每讀史籍，對諸葛亮之遇強敵而能安謐，謝安之逢大軍而能冷靜，因之而由弱趨強，由敗轉勝，常為欽佩不已。今觀蔣公之從容與鎮定者，則超乎前人與勝乎前人多矣。

(六)

蔣公雖於「不同的場合必定換不同的衣服」，但其衣服之口袋裏，「必定有支短短的紅藍船筆」；此乃為隨時讀書、隨時圈點用的（註一四二）。民國六十一年（一九七二），蔣公因病住榮民總醫院休養年餘，在病情較重時，則「每日由一技術員為蔣公作全身按摩，活動肢部各關節」（註一四三）；其時行動已不能從心所欲，雖不能持書自讀，但因「喜愛唐詩，故亦常命護士誦讀其喜愛之詩篇」（註一四四）。

蔣公之好學，乃是終身以之，且愈老愈篤；孔子之篤於學，乃「不知老之將至」（註一四五），而蔣公之篤於學，尤「不知死之將至」；如秦孝儀述曰：

總裁逝世前在病中，曾要隨從抄一份國歌給他，他說：「我要經常唸」（註一四六）。

侍衛長鄒堅為讓蔣公看得清楚，特請人以大型正楷抄呈國歌，蔣公將其「放在床的面前，每天都可以看得到」（註一四七）。蔣公之弘毅精神，以與孔子較之，誠屬前聖後聖，其道為一；蓋其發憤讀書，「樂在其中」（註一四八）、「不改其樂」（註一四九）。所以舉行「小殮」禮時，夫人親將蔣公平日常讀之聖經、四書、唐詩、三民主義、及荒漠甘泉，置於棺內（註一五〇）。此舉最合蔣公心意，其在天之靈必因此而益得欣慰。

第四章 科學的讀書方法

(一)

蔣公之革命事業，乃繼承於 國父者，其治學方法，亦多繼承 國父而來。蔣公自幼的偉大特點之一，即為「好學湛思」，而 國父之所以由衆人中特識於蔣公者，似亦與其「好學湛思」之素養有關。如毛思誠述曰：

夫以 總理之與 先生（蔣公），識之於衆人所不知之時，堅信其能繼承革命大業，而專一倚畀，閱久彌深，精誠契合，自有其歷史；而 先生之艱辛卓絕，好學湛思，與夫人格之偉大光明，及治事之條理縝密，用兵之策算神奇，亦自有其素養（註一五一）。

案：蔣公之所以成爲既能「治事」、又能「用兵」之全才者，除其先天之秉賦外，則「好學湛思」爲絕大原因。以論 蔣公之「好學」，只要有利於革命、有利於治國者，可說無書不讀，此一精神，乃完全取法於 國父者，如 蔣公於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對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訓示曰：

我們 總理這十幾年來所講的話，都是精切平實，句句可以應用的，他是
以心理、統計、社會、倫理、哲學、邏輯、政治、經濟、軍事等各種學問
爲根據，再拿中國的風俗習慣、歷史法度，以及各種的情形爲中心，而參
考各種的科學，斟酌損益，方能得到這切實的三民主義（註一五二）。

案：蔣公讀書範圍亦甚廣泛，閱其所訂之書目，又幾與 國父盡同（註一五三）
。至於其「好學湛思」所用之「推理」方式，亦爲師法與承襲 國父者。如 蔣公
曰：

推理的方式不外兩種：一是歸納，一是演繹，前者是由各種特殊現象來研

究一切事物當中所通有的原理原則，後者是將一切已知的原理原則或一種假定應用之各種特殊事物，而求得其結果，這都是我們做研究工作時最要注重的科學基本法則，這就是 總理所說的「理則學」（註一五四）。

可知 蔣公的思想不但與 國父相通、 蔣公的道統不但與 國父相繼，即其研究的宗旨與思維的法則，亦與 國父同心同德，前後如一。所以「 蔣公經常將三民主義閱讀圈點，多所體會，因之 蔣公的經濟思想裏，無時無刻，均以實行三民主義為職志」（註一五五）。譬如 蔣公有關金融方面的思想，乃是淵源於 國父「錢幣革命」一書；據金克和研究， 蔣公「認為『貨』是『錢』的骨幹，並以生產力量支持貨幣的價值」。因此，「八年對日抗戰期中，通貨膨脹壓力很大的時候， 蔣公總要大家研究『錢幣革命』一書，尋求改進方策」（註一五六）。

蔣公愈研究、愈充實，則愈佩服 國父；復因愈佩服國父，故亦愈願研究、愈能充實。如 蔣公曰：

我們相信無論那一個學問家、政治家、革命家，都沒有高大得過 總理，遠超得過 總理，我們 總理是集中外古今的大成，中外古今一切思想的精華與最緊要的東西， 總理統統集中起來了。我們要在中國講政治、學政治、做政治，就是要從 總理所已經教給我們，已經做出來的東西，首先講求起來。我們相信如果能把 總理所有的書，所講的話通能真正切實的研究，那便是一生一世也用不盡的學問（註一五七）。

蔣公真的把 國父所有的書、所講的話，研究得很徹底、很貫通，譬如 蔣公論「孫文學說」之書時，曾如此說：

孫文學說這本書，不僅於心理改造之精義所在，闡發無遺，而且其文章之古雅高尚，無與倫匹！各位可以當作精讀之書，一定百讀不厭。至於研究方法，一面我們要體察書中的哲理，虛心涵泳，融會貫通，一面就要實行心理的改造，確立革命精神的基礎。久而久之，我們的精神和文字，一定都可以得到很大的進步（註一五八）。

案：此固爲 蔣公所勉勵於革命同志者，亦爲 蔣公之親歷寫照，蔣公不獨視國父所有之著作都爲「精讀之書」、而爲之「百讀不厭」，並在民國初年至八年（一九一九），時常與國父「討論學術」，且蒙國父「獎勉備至」者（註一五九）。可知 蔣公乃盡得國父思想的精華而弘揚光大者，所以我們立志效法 蔣公與研究 蔣公，便可得到「一生一世也用不盡的學問」（註一六〇）。

(二)

蔣公深知國父對於中國經書最稱道者，第一爲大學篇，第二爲大同篇；如曰

總理研究政治、經濟、社會、軍事各種學問，對於古今中外的學術，當然是博大精深，我們亦無法窺測；不過他對於中國的經書，其平時所最稱道最篤信的，第一是大學篇，第二是大同篇，這至少是我個人對總理所能瞭解，而深信不疑的（註一六一）。

所以 蔣公所著「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則完全符於「大同篇」之旨義。而讀書之要則，則完全依據「大學篇」。如曰：

大學第一篇，乃孔子所說，而是他的門人曾子所紀述的。本書的前面，朱子還做了一篇很重要的序，大家必須詳細研讀。不僅讀大學要如此，我們隨便看什麼書，都要先看序文，因爲序文的宗旨，都是要將他全書的內容，提要的說明與評論（註一六二）。

因爲「無論閱讀何種書籍，最要是看他的序文，或是緒言，這就能得到全書綱要之所在，而後再讀全書，才能得到明體達用的結果」（註一六三）。所以 蔣公讀書「是從第一頁的序言或者凡例讀起，一直讀到最後一頁爲止；一部書沒有讀完，決不讀第二部」（註一六四）。對此，蔣公曾有明訓；如曰：

即如看書，一定要實實在在的看完一本，再看第二本，否則對於書的精義所在，毫無所得，無論你看得怎樣多，看得怎樣快，也是無用（註一六五）。

)。

案：讀書要「看完一本，再看第二本」者，此即篤誠與恒毅之表現，亦即有始有終與貫徹始終之意義。

其實 國父早曾傳誨於 蔣公者，即是大學與中庸二書、對於修身立業的重要性；如 蔣公於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三月，對參謀長會議訓示曰：

大家都是國民革命軍的軍官，都是 總理的信徒，亦即是 總理的部下。所以我們無論修身立業都要依照 總理的精神，始終貫徹到底！總理平生常對我們說：「我們要成功立業，不可不研究大學、中庸」。近年以來，愈覺 總理的教訓，真是一點不錯（註一六六）。

由此可知 蔣公所以竭力研讀大學、中庸，並竭誠撰著「科學的學庸」（註一六七）之主旨與要義矣。

蔣公說：「我們既然確定了我們所要研究的學問或是要做的主要事業之後，在着手未做之前，一定要把握其重心之所在，無論任何事物，一定要有他的重心」（註一六八）。蔣公並引古人之語曰：「舉網者必提其綱，振衣者必掣其領」；如此則「一綱舉，萬目張；一本立，萬事理」矣（註一六九）。蔣公以此為「基本要旨」，亦為「最高原則」（註一七〇）。其對「大學」與「中庸」二書之重視情形，可由下列一段訓示充分徵見。如曰：

……………這就可以看出中庸是「本體論」，而大學則是「方法論」，乃是我們中華民族四千年來古聖昔賢遞相傳習的「道統」（註一七一）。

「大學」與「中庸」二書，既然為中國文化之「道統」所在，則其重要性可知；所以 蔣公既以之教其部屬，可親之為「國訓」，又以之而教其公子，可視之為「家訓」。如經國先生曰：

記得六年前， 父親在此（案：日月潭）為我講解大學和中庸，認為大學不僅是「初學入德之門」，是一種方法論，而且是一種做人做事成功立業的大道理大學問，所以「教人治人的人，無論就知識範圍的教育方法，或

就道德範圍的政治哲學來說，都不可不懂這大學之道」。而中庸闡發的道理，可說是一種本體論，大學與中庸兩者要融會貫通，因為這兩本書「乃是一部哲學與科學的相互參證，不僅是心物並重內外一貫，而且是知行一致的最完備的教本」，所以要稱之為「科學的學庸」（註一七二）。

案：蔣公為弘揚中國的道統，為闡揚 國父的思想，可謂效其誠而盡其力矣。

(三)

蔣公曾引艾因斯坦之言曰：「人們把我的成功，歸功於我的天才，其實我的天才只是刻苦罷了」（註一七三）。因此 蔣公對於治學，最注重恒心與毅力；如曰：

大家要曉得，只要我們看書有恒心，必因恒心而發生毅力，就可養成自強不息，努力不懈的習慣，那麼，不論是什麼艱難的事業，都可做成，何況是看書研究學問這件人人可能的事情。……（註一七四）。

因為事業之成功，不能單靠聰明才力，必須依憑學問； 蔣公且認定「學問是一切事業成功的保證」（註一七五）。如曰：

天下大事業，決沒有不要學問，而可以隨便成功的，否則，即算成功，也是僥倖一時，到最後還是要失敗的。因為一個人僅僅運用自己的腦力思慮，而不講究學問，那麼「思而不學則殆」，無論你有多大的聰明才力，要成功大事業，是不可能的（註一七六）。

案：由此可知 蔣公乃是重視與倡導思與學的結合，而思與學如何結合？此即屬於治學方法之範疇矣。

治學之基本方法，即是聚精會神，「專心壹志」， 蔣公又藉曾文正公之言以言曰：

曾文正公言：「辦事、讀書、寫字，皆要眼到、心到、口到、手到、耳到」。此言做事時，眼、心、口、手、耳五者，皆要齊來，專心壹志，方能

做好；凡讀書寫字，皆應當作辦事看也（註一七七）。

在「五到」當中，蔣公似乎特重「心到」，亦即重視「思維」的方法；如曰：

研究重在思維，故研究運用腦筋時，必須要有條件理有法則，亦就是要有條有理、有法有則（註一七八）。

案：凡治事與治學之有效有成者，則必須「有一種敏銳的觀察力，一種綿密的思考力，一種豐富的聯想力」（註一七九）。此所謂「思考力」與「聯想力」者，皆為「心到」的註解；何況蔣公又藉荀子之言以論之曰：「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註一八〇）；此即「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註一八一）的「專心壹志」之「心到」之義（註一八二）。

對於運用「心到」的歷程，蔣公曾為之特作解釋：「就思想的起源來說，就是要由概念而判斷，由判斷而推理」（註一八三）。思想有了「起源」，還要求其「發展」，而發展之極致，則在乎「推理」，如蔣公曰：

再就思想的發展來說：我們怎樣來推理？推理的方式不外兩種：一是歸納，一是演繹（註一八四）。

歸納與演繹各有其途，亦各有其用；換言之，其性質與作用各不相同。蔣公說明曰：

總之，歸納法是事物的解析與綜合；演繹法是經驗之融貫與推廣。兩者相續相成，缺一不可（註一八五）。

雖然歸納與演繹兩種治學方法，應該「相續相成，缺一不可」，然若就其最基本之重要性來說，似乎應以歸納為主，演繹為副；且前者為首，後者為次。如蔣公曰：

大家要明白求甚麼學問、預先要知道提綱挈領，要是只看書不歸納，是不能知道大義的；教人和自學都應預先知道這要點，這要點是由自家歸納來的（註一八六）。

案：歸納所以較之演繹為主為首者，乃因「認識問題及其焦點之後，即應考慮解決

問題最有利的「方法」(註一八七)。而歸納最適於認識問題之「焦點」，且以之為解決問題的有利「方法」。並且，演繹者，為「觀摩學習，是外鑠的進步」；歸納者，為「研究發展，才是內發的成長」；所以 蔣公曰：「由內發的成長，輔之以外鑠的進步，那就能盡擷天下之衆長，而馳騁天下之至堅了」(註一八八)。

(四)

國父之治學，最重實地考察，例如在滬撰寫「實業計劃」時，曾命邵元冲親詢土人，乍浦與澉浦一帶究係石塘或土塘(註一八九)？此一精神與方法，直為 蔣公所師承。蓋 蔣公之治學，最主張以「客觀精神」(註一九〇)而求其「參照印證」(註一九一)；讀過 蔣公「科學的學庸」(註一九二)與「科學的道理」(註一九三)諸篇論著之後，則可益增瞭解與益增徵信。蔣公會援西方兩句諺語曰「先進的國家，先有事實，後有理論；落後的國家，先有理論，後有事實」(註一九四)。這顯然是以事實重於理論的科學態度，對此，蔣公會詳析，如曰：

如果僅僅有書本上的知識，而不能隨時拿實地的經驗和情況來互相印證，那麼，這種學問也始終是空洞的不切實用的死東西，所以我們要求真的知識、活的學問，一定要能多看書，而且要將書本上所講的理論，與自己的經驗閱歷以及一切客觀的實際情形互相印證，比照研究，使理論與實際融合貫通，學問與經驗打成一片。……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

總理說：「用古人而不為古人所奴」，曾國藩讀書的要領在能「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八個字，這就是我們讀書的要訣。……我們如果用客觀的態度，來研究和批評所讀的書，那麼，讀書真能獲益(註一九五)。

在科學時代，必須俱備科學精神，所謂科學精神，就是一切憑事實、憑證據，譬如為籌劃西北大計，蔣公於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曾命顧祝同葛集左宗棠經營西北的建樹與著作(註一九六)。此一風範，與 國父之當年完全一致；由 蔣公的訓詞中，可明白看出其一脈相承的學統。如曰：

在現在科學進步的時代，還必須更加精確的、不斷的研究、不斷的實驗，有了事實，再進一步充實理論、印證理論，然後復根據理論，擴大其對事實的研究。……所以 總理說：「我們要拿事實做材料，才能夠定出方法，如果單拿學理來定方法，這個學理是靠不住的；這個理由，是學理有真的、有假的，要經過試驗才曉得對與不對」（註一九七）。

案：國父與 蔣公皆為儒家之宗師，其此一科學精神，亦正是儒學精神，如孔子治學之「四絕」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註一九八）。孟子則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註一九九）。

(五)

蔣公讀書，固喜安靜，但亦極願與碩學高才之士相與「研索」，以求「精進」；如孫詒載述曰：

（蔣）公喜讀通鑑，嘗曰：「近日讀通鑑較有味，自恨用功之晚」。一日，廖仲愷過訪，與論唐藩鎮事，廖去後，公取通鑑讀之，覺更有見地，乃歎曰：「學問須有人相與研索問難，方有精進，如不與仲愷論此事，則當時大勢與其相互之關係，詎能明瞭若此乎」（註二〇〇）？

案：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以後，蔣公「就很少有與 總理討論學術的機會」（註二〇一）；及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國父逝世，仲愷遇害，蔣公益為痛失良師益友，但其仍「和黨內許多同志研究」，後來「並與陳布雷先生往復討論」（註二〇二）。

蔣公統一全國，定都南京之後，一則為修明政治，一則為研討學術，經常邀請京滬區各界造詣特深之人物，往南京官邸交談，研討各項問題（註二〇三）。並以求知若渴的虛心態度，定期舉行學術演講會，親自參加聽講。如羅家倫述曰：

他（蔣公）在杭戰以前常教朋們為他邀請學者專家，按照他所開的學科，作系統的演講，由他虛心聽取。這種辦法，在軍情最緊急的杭戰時期，

也還實行過（註二〇四）。

來台之後，尤特倡導「質疑問難」與「辯論求真」的學術風氣，蔣公曾剴切昭示曰：

今後國軍教育，應特別提倡質疑問難的精神，實踐「學術無分彼此，辯論不問階級」的要旨。我國一般人不論求學或討論問題時，所犯的通病，為不肯存疑發問，尤其沒有辯論求真的習性。……（註二〇五）。

總之，蔣公治學最重「反覆論證的方法」（註二〇六），譬如蔣公曾於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將手著「科學的學庸」稿本，親請錢穆先生「逐條指出，以便改定」；嗣後又再召見研討，並面致謝忱（註二〇七）。

(六)

蔣公最慣用「比較方法」研究學問，例如其以商子與管子作比較研究，而認為「商鞅的『農戰』政策，即以管子為本，用於秦國、秦的軍隊竟能統一中原」（註二〇八）。又以西方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比較研究，發覺前者主張干涉政策、而重視貨幣；後者主張放任政策、而重視物資（註二〇九）。又如「嘗看吳子完，復看孫子，至『虛實篇』，不禁歎為觀止，謂是非吳子所及」（註二一〇）。並以「太戈兒傳」與「列寧叢書」比較研究，則曰：

太戈兒以無限與不朽為人生觀之基點，又以愛與快樂為宇宙活動之意義；列寧則以權力與鬭爭為世界革命之手段；一以維心，一以維物（註二一一）。

對某種學說、某種思想，只要比較研究、對證檢討之後，則真假畢露、是非立顯；如蔣公以黑格爾之學說與馬克斯之思想，比較研究與對證檢討之後，則曰：

黑格爾與馬克斯的哲學思想完全是相反的，而馬克斯所採取黑格爾的辯證法，決不是其核心，而僅是其外殼，如其不信，我就可以引黑氏的話加以反證；……（註二一二）。

所以 蔣公 很誠懇的盼望「我們反共學者，能將黑（格爾）、馬（克斯）二氏的學說整個研究，獲得一個正確的結論」（註二一三）。案：此所謂「整個研究」者，亦即「比較研究」之義也。

蔣公 每對一門學問作比較與綜合之後，必能得到新意義，與獲得新結論；例如中國儒家與法家都主張「兵農合一」與「全國皆兵」，但兩者的神髓與心術則異。

如 蔣公 曰：

儒家主張以田養民，法家主張以田養兵。以田養民則爲了保衛田園，全民皆兵，這是王道；以田養兵，則兵雖可以力戰而民不免於困窮，這是霸道（註二一四）。

因爲 蔣公 最慣於比較研究，所以雖然「一部書沒有讀完，決不讀第二部」（同註一六四），但却必須與必然一本一本的繼續不斷的讀書；此所以讀過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之後，接着即讀馬漢的「海軍戰略論」之原因（註二一五）。否則，如何比較與綜合？

(七)

蔣公 讀書，慣以「紅藍筆批註，重要的地方用槓，更重要的地方打點點，最重要的地方打圈圈，再加眉批，寫自己的心得」（註二一六）。所以 蔣公 「經讀之書，眉端行間，朱墨爛然；評論講貫，皆有條理」（註二一七）。如經國先生說：

父親又常常把自己閱過的各書交給我讀，書中不但有 父親親筆的圈點、批語和心得，並且還將重要的地方用記號提示出來（註二一八）。

經 蔣公 「提示」出來的「批語」，確乎極其重要；例如蔣公 讀過趙翼著「廿二史劄記」的「三國人才最盛」之頁，批註曰：

趙翼 謂三國人才最盛，亦惟三國之主，各能用人，大概曹操以權術相馭，劉備以性情相契，孫權以意氣相投；權術相馭，余耻爲之，若意氣相投與性情相契二者，則余所願學也（註二一九）。

由此觀之，似乎 蔣公皆於重要之處批註之，其實並不盡然，蓋易被人所認為不重要之處，而 蔣公有時却認為重要。譬如 蔣公曾曰：「越是零的數目，越不好差錯；越是小的事物，越要注意」（註二二〇）。治事如此，治學亦然。

蔣公對於一本好書，總是愛之不忍釋手、「用紅筆、藍筆、鋼筆、墨筆再四圈點、眉批、改正譯筆錯誤的手跡，而且本本都已斷線毛邊」（註二二一）。總之，蔣公「青年期期，追隨 國父，養成了好讀書、好研究的習慣」（註二二二）；所以 蔣公「房子的一旁放着許多書櫃」，並且都是「紅木的櫃子配着綠色的古體字」（註二二三）。這些書櫃中所貯者，皆為 蔣公閱讀過與批註過的許許多多古書，「以及現代的有關經濟、有關軍事、有關政治、有關管理各方面的書」；將來要移送黨史會來整理與保藏（註二二四）。

(八)

蔣公讀書，不獨手勤，口亦勤，讀聖詩與唐詩時，當然樂於吟詠朗誦，以盡其「唱詩行歌」之情（註二二五）；即讀及各家文集之時，興之所至，亦「輒低回諷詠」，且常「嘖嘖稱歎」（註二二六）；而早課前之散步時，則偶而「朗讀朱子中庸章句序」（註二二七）。對於古文，則主張「讀得爛熟，背之再背」。如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六月六日，函示於長公子曰：

現在要文章進步，第一還是要多讀古文，並須讀得爛熟，背之再背；大約每篇古文至少要讀一百遍以上（註二二八）。

至於一部「四書」，不獨要深明其意義，並且「每篇總要讀三百遍」（註二二九）。至於普通應用之典籍，亦主張「人手一冊，隨時研讀」，譬如民國五十四年（一九六五）五月二十日，頒發「新剿匪手本」，即手令全國將領「尤應精思熟慮」；同日並頒訂「國軍將領反攻作戰須知」，亦手令「每星期不論晝夜，至少研究兩遍」（註二三〇）。案：蔣公為宗於 國父「知難行易」與陽明「知行合一」之人，其所囑咐於後輩之各節，必早已身體而力行之矣。

第五章 闡發革命哲學

(一)

現代戰爭，雖在形式上亦如往古一樣，為軍事戰；但在實質上却為學術戰與思想戰；尤其與共黨作戰，更脫不了精神戰與理論戰。檢討過去的失敗，此為主要癥結。如 蔣公曰：

我們過去的失敗，是失敗在革命精神的喪失，也是對革命的理論，和革命的方法，欠缺認識、欠缺研究的上面。……我們三民主義的理論，除開 總理遺教，給予我們最高的準則以外，黨中同志，雖有許多詮釋、許多發揮的著作，但是始終都未能把黨的理論基礎，正確而統一地建立起來（註二三一）。

所以 蔣公「在其出而担負國家重任五十年中，戎馬倥傯，軍事叢脞，迄未有寧；然而始終不廢讀書，兼及著述」（註二三二）。正如曹聖芬說：

（蔣）總統的論著之富是大家都知道的，根據統計，總統每年寫的文章，發表的文告和演講，平均每年在四十篇以上（註二三三）。

因為 蔣公最愛讀「人生哲學」之書，故能對「生活的目的」與「生命的意義」，均能有所創獲與論著。如曰：

我常常愛讀人生哲學的書籍，起初對於人生的認識也是不明瞭的，後來才把人生的目的，歸納為兩句話，就是：「生活的目的，是增進我們人類全體的生活；生命的意義，是創造其將來繼續之生命」。這兩句話，前一句是指生存時說的；後一句是指死後說的（註二三四）。

案：蔣公「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之巨著中，將人類全體的生活與民族繼續的

生命，完全予以具體化、計劃化、與精密化。

抗戰期間，爲了一面抗戰、一面建設，更爲抗戰勝利後，「共策世界永久和平與普遍安全」；蔣公於千忙萬忙之中，猶以「四十天的工夫」，完成「中國之命運」的初稿（註二三六）。並廣泛徵求意見，「經過七八次乃至十餘次的修訂與增刪，方纔定稿」；雖有主張宜將書名改爲「中國之前途」者，但蔣公認爲「這一書名唯一的根據就是國父所說『國家之命運在於國民之自決』。這句話就是全書的宗旨之所在」（註二三七）。可見蔣公措意之所據，與用心之所在。

蔣公對革命哲學之發揚、與對革命理論之提高，均曾極措其意與極用其心；譬如蔣公綜合研究國父「知難行易」學說與陽明「知行合一」哲學之後，則提出「寓理帥氣」四字、作爲修心養性與待人處事之準據。如曰：

……………惟「性」之爲物，是不可形容的，既不可形容，爲什麼又有「能」？據我研究所得，只有以「寓理帥氣」四字來表現其性能，因爲氣之爲物，乃是無形而流動的，這氣的流動，就是我國哲學中所說的氣之關闔往來，有一定的法則，我以爲這法則就是「理」。但是說到最後的結果，這「性」與「理」與「氣」三者，如果要其發生效用，仍只有合一而不能分離的。因爲性如無理與氣，就無從表現其能；如理與氣無性，亦將無所附麗。蓋氣只有在關闔往來而成事成物之中有其存在；所謂「能」亦然，於質與質的遞變，和質與力的互變之外，其「能」亦無從表現。故中國哲學說「理之外無氣，氣之外無理」，就是說氣與理是不可分的，我以爲性與理的關係，亦可以說性之外無理，理之外無性，這亦就是我認爲性寓於理的意思，乃可以說性就是理，所以性與理亦就不可分了（註二三八）。

可知違反人性、悖逆無理的暴行邪說，乃是性中無理、與理中無性的身心分裂者、與心性變態者；這是何等有力的反共武器！蔣公於民國四十五年（一九五六）一月曾說：「二十五年之間，對於革命哲學的闡發，自問已竭盡心力」（註二三九）。每讀蔣公之著述，則益令確知與確信，更益令感動與感奮。

(二)

當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期間，蔣公即發覺共黨分子以其囂張之理論、作歪曲之蠱惑煽動，則深為隱憂。如曰：

……………但是我又在本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期間，發現共黨分子挾俄自重的一切言行，和本黨黨員盲從共產主義的迷惘心理，深以本黨不能達成總理所賦予的任務為憂（註二四〇）。

國際共產黨對中華民國政府與蔣公個人之誣蔑攻擊，可說與日俱增、且無所不用其極，其目的在顛覆中國合法政府、而由中共取其政權而代之（註二四一）。析言之，共黨潛伏、滲透與顛覆、破壞之慣用伎倆，就是「矛盾律」、「否定律」、與「變質律」（註二四二）。可惜「本黨黨員盲從共產主義的迷惘心理」作祟（同註二四〇），不知警醒、不知振作，以致「無形中造成對你自相『矛盾』、『否定』、『質變』的規律，被其『突變而統一』了」（註二四三）。其實對付共黨的三定律，乃容而且易之事，譬如蔣公指出：對其「矛盾律」，則「內部必須團結無間」；對其「否定律」，則「必須自強不息，日新又新」；對其「質變律」，則「必須嚴肅鎮密，防諜保密」（註二四四）。可惜，我們未能善體蔣公之意，在理論上未能充實，在組織上來能加強；以致坐令敵人攻擊，而未能直攻敵人。如蔣公慨乎言之曰：

這幾個原則，是我研究對共產集團謀略戰所獲得的結論，也是我們進行三十年反共戰爭所得來的血的教訓，過去因為大家沒有認真研究，確切運用，更不注意這個法則、去熟籌對策，反擊敵人，結果處處為敵人乘虛抵隙，坐令共匪對我「擴大矛盾」、「製造否定」、「加速突變」，致使我整個大陸為其竊據，革命事業，幾致中斷（註二四五）。

若能揭穿共黨所以濫用「三定律」之陰謀所在，則將之攻破，並不困難；因其陰謀不過如此，如蔣公曰：

總之，共產匪徒所以要假黑格爾的「矛盾律」，只是要爲他所製造的階級鬭爭找論據；他之所以要假借「質變律」，只是要便於遂行它的暴力和詭謀；它之所以要假借「否定律」，也就是要否定人性，以便於其製造仇恨鬭爭而已（註二四六）。

要攻破共匪的「矛盾律」，只要以其「所說矛盾的例子，來反證他的矛盾」即可，譬如彼云：「兩腳走路時，不僅是前一個腳和後一個腳的矛盾，而且是同一腳踏下去同時又提起來的矛盾；不僅是一隻腳前半隻踏下去時，後半隻已在提起來的矛盾，而且是同一隻腳上的每一點都是正在着地，同時就在離地的矛盾」（註二四七）。對此，蔣公駁而釋之曰：

你看像這樣矛盾律的說法，那裏是根據什麼哲學的觀念？大家都知道走路，前一隻腳是向前，後一隻腳也是向前，這其間有什麼矛盾存在呢？要有矛盾，那除非是前一腳在向前，而後一腳却要後退，像「拔河」一樣，一個要向東，一個要向西，那才說是矛盾（註二四八）。

依共黨之「否定律」，認爲「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彼此鬭爭，互相殘害，一個否定一個的」（註二四九）。蔣公駁釋曰：

誰都知道，宇宙是無一時無一刻不在變動的。然而宇宙雖在不斷的變動，惟其有一絕不動變的法則與規律，同時存在其中，而無法否定的。這法則和規律，我們可認之爲天體的軌道，所有宇宙星體都是循着這軌道運行，而且是永不「越軌」的。由此可見「天行有常」、「周行而不殆」了。大家都知道：四時之變，晝夜之分，是由於地球公轉自轉的緣故。有了這種規律性的變動，才有春耕、夏長、秋收、冬藏的自然現象，也才有晝起夜伏、朝作夕息的生活規律。而這四時運行中雖有寒暑冷暖、晝明夜晦等相反或矛盾的現象，但其相反的目的，乃是爲了相輔相成，也就是爲了繼續不斷的運行發育（註二五〇）。

更爲駁斥共黨「由量變到質變」的謬說，蔣公繼續以其矛攻其盾曰：

共匪爲佐證其「由量變到質變」的謬說，乃以雷峯塔倒塌爲例，說塔的磚石一天天被人搬走，這是量的變化，而塔因磚石被人搬得太多，於是倒塌，這就完成了質的變化，於是就知道它們所謂量的變化，就是指磚石，所謂質的變化，就是指寶塔來說的。如照常理來說，若單就塔而言，那磨塔就只是在隨時可能倒、將要倒、一定倒的「動變」過程中而已。這種「動變」就應該僅僅說是質的變化，不能算是量的變化。但如就磚石來講，雖然磚石一天天被人搬走，可是那搬走的還是磚石，搬走只是量的變化，却談不到是質的變化（註二五一）。

綜上所述，則「誰是民主，誰是科學，以及誰不民主，誰不科學，不是已經很明白的證明了嗎」？所以 蔣公號召我們「以更多的民主，去打擊反民主、假民主；以真實的科學，去打擊反科學、假科學」（註二五二）。

(三)

對於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哲學，蔣公自述曰：「我是自十八歲從讀顧葆性先生時候起就開始研究的，以後五十年來，更曾經讀了再讀，研究了再研究，他的『傳習錄』與『大學問』這兩個小冊子，真是使我百讀不厭，心嚮神馳，不知其樂之所止」（註二五三）。但是以前 蔣公「對於 總理學說與陽明哲學不能符合之點，求之於心總有不安，又因 總理逝世太早，無從質疑」（註二五四）。於是 蔣公潛心研究多年，才得到其相通與相同之精義所在。如 蔣公曰：

……………照這樣說，王陽明所講「良知」的知，是人的良心上的知覺，不待外求；而 總理所講「知難」的知，是指一切學問知識之知而言。這種知是不易強求的，而且這種知識的「知」，亦不必人人去求，只要人人去「行」就得了。我們理解了這一點，便知 總理所講的「知難行易」的知，同王陽明所講的「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知，其爲「知」的本體雖有不同，而其作用是要人去行，就是注重行的哲學之意，完全是一致的（

註二五五)。

蔣公並說：「陽明學說只在勉人『致良知』，所謂『致』就是『力行』……所以……總理所講『知難行易』的『知』，同王陽明所講的『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知』，……就是注重『行的哲學』之意完全是一致的」（註二五六），其所以再一次的如此強調，即為加強「力行」與「實踐」之義。

時代背景可以影響與決定人的思想意識，蔣公所以認定陽明與國父皆為注重「力行」與「實踐」者，就是由其所處的時代背景，作為研究的起點；例如蔣公講述陽明的哲學背景時，曰：

他（陽明）因為當時中國民族麻木、消沉、散漫、萎靡。只講玄學、玄教。儘是講，而不去行，這實在是亡國滅種的現象。……他知道當時之所謂儒教，只注重靜的一方面，而不能提倡動的哲學，僅僅向靜的方面發展，大家伏在桌子上翻死書本，而且互相標榜，弄得門戶之見，非常之深。……王陽明的眼光，當然超過他同時代的一切讀書人，他雖未到明末時代，但他早已看見中國民族將來不得了，一定會給外族來侵略，所以他到後來專提倡動的哲學，而批評靜的哲學（註二五七）。

國父所處的時代背景、同於陽明，而二人皆為「先知先覺」者，所以二人所見亦同。如蔣公講述國父的思想背景時，曰：

總理發明「知難行易」的原理，完全是要我們注重「行」字；因為總理生在滿清末年，與王陽明生在明季一樣，同時看着中國人中了幾千年來「知易行難」學說的毒，一般士大夫，不是學漢儒解經，就是學宋儒講性，結果空疏迂濶。為補實用，所以王陽明使用「知行合一」的學說，來醫治當時中國的民族性，而我們總理更進一步的「知難行易」的學說，要來啓發中國的民族精神，並用來實行的革命主義（註二五八）。

蔣公歸結而言之曰：「孔子之道，至漢儒而支離，至宋儒而空虛，至王陽明而復興，迨至我們總理而集大成」（註二五九）。

(四)

自 國父逝世之後，「研究和闡揚他的主義和思想的人，雖然很多，比如已故 黨國先進戴季陶和胡漢民兩位先生，在理論和學術的修養上，可以說都是很了不起的人物」；但若以之與 蔣公相比，則便「望塵莫及」（註二六〇）。所以林桂圃說：「談到對三民主義的理論真正有更多更大的積極性的貢獻，並真能繼承 國父思想的，應當首推 蔣總統了」（註二六一）。誠然，蔣公對 國父遺教研究最精詳，瞭解最透徹，在其著述與演講中，隨時引取 國父的語句，皆各恰到好处；並能將 國父思想溶進各種學說（註二六二）。經國先生領會頗多頗篤，如曰：

領袖一生繼志述事，對於 國父遺教，一方面詳加闡明，一方面積極實踐（註二六三）。

茲舉述 蔣公兩段文詞，以見其研究 國父遺教何等精細、何等透闢。其一為「中國之命運」第四章：

國父有「十年國防計畫」的著作，毀於陳炯明叛亂之中，如今只存目錄。然 國父的意旨，在軍事方面，具見於創設軍校的訓詞之中；在經濟方面，具見於「實業計畫」之中；在心理方面，具見於「孫文學說」與「軍人精神教育」的演講之中（註二六四）。

其一為「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第一章：

……住與行兩大問題和解決的辦法，從「實業計畫」裏可以看出一個輪廓，做我們研究的基礎。但是我們從 總理在民國十三年以前關於民生主義的演講和論著裏，可看出民生問題，除食衣住行之外，還有育和樂（註二六五）。

讀過 蔣公「總理遺教概要」之「六講」之後（註二六六），則真令感到 國父已與 蔣公同在，且 蔣公已無異於 國父。

蔣公之學 國父，不獨學其心緒、學其思想，並且學其風格、學其文章。如曰：

……………故心理建設的重要根據，還是「孫文學說」這本書，不僅於心理改造之精義所在，闡發無遺，而且文章之古雅高尚，無與倫匹！各位可以當作精讀之書，一定百讀不厭。至於研究方法，一面我們要體察書中的哲理，虛心涵泳，融會貫通，一面就要實行心理的改造，確立革命精神的基礎（註二六七）。

因此，國父之思想全部被蔣公吸收而融會之，接納而貫通之；唯其如此，故蔣公能曰：「國父的『實業計畫』，論規模，比漢唐的道路水利計畫還要偉大；論條目，比漢唐的經濟律令格式還要細密」（註二六八）。因為國父最推崇禮運篇的「大同」一章，所以其「眼光注射到中國每一個地域，要使其各得其所」（註二六九）。以蔣公最精於國父思想、最詳於國父思想，故其最長於、亦最慣於發出國父思想、以摧破馬克斯思想（註二七〇）。

(五)

蔣公「涵泳」於古今典籍之中，累積其既有深度、又有廣度的學問寶藏、與學術思想；雖然常有獨到的見解，但這獨到的見解，却最易為人理解與接受。茲述蔣公解說「文化」的意義於次：

我們可以說，離開了自然法則與社會法則（即物理與倫理），不獨人的生活為不可能，亦且失去人之所以為人的特質（人性）。此依照自然與社會的法則的生活方式，稱為文化。……………故求生的活動便構成了文化的活動，而有不斷的進步（註二七一）。

所以「文化」的基本要義，便是順乎「人性」與適乎「法則」；合乎此者即為仁政，反乎此者即為暴政。蔣公之言，雖然未及反共，而言中之義、却充滿反共。

又如蔣公對「政治」二字所作的解說，雖然亦甚平易，但却深具大義；蓋其既合乎傳統思想，又符於國父遺教。如曰：

……………。而我們的革命政治之最大目的，和我們學政治之最大目的，就

是要治國平天下，故我說治理衆人之事者，即治國平天下之謂也（註二七二）。

蔣公曾經指出：「政治的目的本來不外乎解決人民的需要」（註二七三）。可惜「近來研究政治的人，不是把政治看得太繁雜、太複雜了，就是把政治看得太狹小、太空泛、而流於形式主義了」（註二七四）。所以蔣公「希望各位同志確實記住政治的起點和終點，都是以人爲本，離却人，離却人生，即離却民生的政治，決不是爲全體人類謀幸福的政治」（註二七五）。如此，則一切爲愛護人、與尊重人，所以三民主義的政治、乃是以「仁」爲本（註二七六）；而三民主義的本質，亦即最合乎人類需要的「倫理、民主、科學」（註二七七）。於是基於三民主義的行政法則，「都是以『生理』組織爲規律的，而不比共產主義一以『病理』爲其一切組織的規律」（註二七八）。明乎此，則自然堅決服膺三民主義，尤自然堅決反對共產主義。

(六)

蔣公特別指出：「一般反共學者，竟對於敵人用以與之鬥爭的唯一法則——『唯物辯證法』，總是聞之色變，根本不敢去覬覦他，更不願去窮究他；這是不敢面對共匪兇險，而存着一種苟免逃避的畏共心理」（註二七九）。因之蔣公更特別指出「馬克斯『唯物辯證法』乃是由黑格爾辯證法『正反合』的原理所脫胎的產物；但是其內容與精神，幾乎是完全相反的」（註二八〇）。尤其說到「辯證法」乃是中國固有的思想方法之一，並非西人所創。如蔣公曰：

說到辯證法的原理，並不是什麼新奇的東西，這些學術，我們中國先哲遠在三千年以前，如易經所謂「一陰一陽謂之道」，就是陽爲「正」，陰爲「反」，太極爲「合」的意思（註二八一）。

辯證的思惟方法既爲中國所固有，而西方學者晚近又復倡導，我們當然應該發揚國粹，並研究與運用西方正宗與正當的辯證法；此即蔣公說：「所以我對革命幹部

教育，始終主張要採取黑格爾辯證法的本意，亦就在他思惟方法的三段落的這個法則而已」（註二八二）。但對這「三段落」之中，蔣公「特別注重『反』的一個段落」（註二八三）。於此，蔣公提示曰：

尤其是我們從前一般幹部、無論他是軍人擬訂一個軍事作戰計劃、或黨員擬訂一個政治鬥爭策略，往往只注意自己本身主觀「正」的方面條件，而對於其對象和客觀，就是「反」的方面各種條件，多不加关注。所以其所擬訂出來的作戰計畫或鬥爭策略方案，多不切實際，不能予敵人以致命的打擊（註二八四）。

注意「反」的思想方法與處事方法，適用的範圍頗為廣泛，固不限於軍事作戰與政治鬥爭，其對於日常工作，處處都不可或缺。如蔣公曰：

如果要那一件工作成功，就要先從失敗的方面去研究；要那一件工作進步，就先要從缺點方面去檢討（註二八五）。

綜上以觀，則知「辯證法」乃是一種思想方法、或思想工具，我們應該正視它、研究它、應用它；既不可對其視為新奇、而畏難却步；尤不可對其不屑一顧、而掉以輕心。

(七)

關於開發中國、與建設中國之著作，蔣公除於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前後發表「中國之命運」與「中國經濟學說」等主要著述外，對革命理論尤為充實、對建設計劃尤為周密、而未及發表者，尚有「中國之開發」一書。據陶希聖之撰文，茲引述於此，以見蔣公之學術修養、與理論體系。如陶氏曰：

這本書將訂定戰後政治經濟建設大綱，要領如下：（一）、以南京為海都，咸陽為陸都。（二）、縮小省區。（三）、劃分經濟建設區如下：（1）、中央區，以武漢為中心；（2）、東南區，以玉山為中心；（3）、西南區，以昆明為中心；（4）、西北區，以天水為中心；（5）、東北區，以瀋陽為中心（註二八六）。

案：「這本書所需資料，由資源委員會及經濟部提供者，文件圖表為三大摺，並已草擬綱目呈進」（註二八七）。可知此書所根據之資料，相當精確；並且國家有「海都」、有「陸都」，則其建國的規模，亦相當弘濶；復就其「縮小省區」與「劃分經濟建設區」之情形視之，則知其設計尤相當科學。換言之，此並非純理論之書，乃為可付實施的建設方案，若以之與 國父的「實業計劃」配合實施，則抗戰勝利後中國富強之期，誠可指日而待。

蔣公正擬撰寫此書之際，「不久即逢日本投降」，在「軍政事務叢集，這本書稿便擱集了」（註二八八）。勝利後，共黨擴大叛亂，此書更無暇撰寫，建設亦無暇實施。但 蔣公的此一思想與計劃，吾輩不可不知，將來復國建國之時，自應本此綱目求其實現；一則告慰 蔣公在天之靈，一則符於 蔣公強國裕民之意。

第六章 留心時事、每天讀書

(一)

凡是賢明的政治領袖，沒有不重視輿論力量與宣傳力量的；也可以說，革命成功與軍事勝利，多由於發動宣傳與領導輿論所造成者（註二八九）。國父如此，蔣公亦復如此。民國肇建，蔣公雖於光復杭州之役中，創建首功（註二九〇）；但 蔣公「筆伐」的力量對革命的貢獻，實不弱於「兵伐」的力量。如楚崧秋述曰：

民國初年，（蔣）總統曾親自辦過雜誌，當時所撰著的時論，曾發生口誅筆伐、鍼時救弊的力量，而為各方所推重（註二九一）。

案：此所謂 蔣公「親自」辦的雜誌，乃指「軍事月刊」而言，由其績效特優，足見 蔣公的文筆長才。如董顯光述曰：

其時國民黨為提倡軍人的政理解，遂創辦一名為「軍事月刊」的雜誌，以供軍人閱讀。蔣總統於所任其他種種職務以外，又被推任月刊的編輯人，在其篇幅之中，蔣總統以中國革命的立場，嚴正討論彼時的國際問題。這些社論，雖針對那時候的題材，然在今日讀之仍使人重感興趣。此可表示那位青年編輯把握政治問題是怎樣的難能可貴，蔣總統掌握此一刊物之命運約兩年之久（註二九二）。

因為「文字宣傳」對人心士氣特具重要性（註二九三），所以蔣公既以第一流的人才投於筆陣，亦在這方面「發掘而培植了不少的人才」。如載：

（蔣）總統時以第一流人才主筆政、盡言責，來期勉黨內同志。過去數十年之間，蔣總統在這一方面，着實發掘而培植了不少人才，其中最為出色的無疑當推戴季陶和陳布雷諸位先輩（註二九四）。

蔣公之重視文字宣傳、與栽培筆政人才，乃是從心由之、終身以之；故曰：「數十年後，蔣總統對於新聞輿論界的重視和期許，更是有增無已，歷久彌堅」（註二九五）。

為針砭時弊、領導思想，蔣公於親主筆政與培育人才之外，尤為常常寫稿，以殷殷提倡。如蔣公曰：

我前在上海「星期評論社」時代（民國八、九年）再三指出：我們如要辯證法的思惟法則，就應該以黑格爾辯證邏輯為根據才行；…………至於黑格爾的辯證邏輯，則很清楚的說明其辯證法為「思惟與實在的合一」，自認其是思惟法則的典型（註二九六）。

抗戰期間，蔣公會指示陶希聖籌辦「新建設」雜誌，以「紹述國父發起『建設雜誌』的旨趣」；雖然終以「軍務倥傯，未付實施」（註二九七）；但却遵照蔣公之旨意，使得「中國哲學會在昆明成立，哲學雜誌在重慶印行」（註二九八）。並於政府遷台之後，責成正中書局創刊「新時代」月刊，俾其負起「新建設」雜誌所應負之使命（註二九九）。綜上以觀，則知蔣公自始即甚重視報章雜誌，亦最

樂讀報章雜誌；蔣公所以「永遠在時代的前面」者，固由其思想、識力、精神之超人超時有以致之，而每日必讀報紙，經常閱覽雜誌，不失為原因之一（註三〇〇）。

(二)

蔣公之閱報，乃是基於對民情、國事、與世局之關切，絕非藉閱報為消遣；蓋蔣公之閱報，乃是眼到、心亦到，不獨研究之，而且處理之。如馬星野述曰：

（蔣）總統自己每天看報，看得非常仔細，他對報紙新聞判斷得正確不正確，言論公正不公正，用字用句對不對，他都有很正確的評判。有時候他就把自己的意見告訴侍從秘書，要侍從秘書打電話給中央社社長或中央日報社長、宣傳部部長或第四組主任。尤其對報紙反映的民意十分重視，有時中央社的參考消息裏有泰國怎麼樣，美國怎麼樣，他都批交外交部、僑務委員會、中央黨部第三組想辦法改進（註三〇一）。

可知蔣公閱報，至為細心、至為注意，所以楚崧秋說：「像他老人家那樣慎思明辦的，更是絕無僅有」（註三〇二）。蓋蔣公「每天花在閱覽新聞，瞭解輿論上的時間，……………至少有兩小時以上」（註三〇三）。

蔣公每日所閱的報紙，不限於一份，並且還有「廣播」和「電訊」；早報之外，又有港報及晚報。如秦孝儀說：

蔣總統每日清晨，單是要看的報紙就有五、六份，另外還有一本本的廣播，和一疊疊的電訊；每天下午又要看三四份港報和晚報（註三〇四）。

蔣公不獨留神全國性大報，亦報批地方性小報，「每次去台北以外縣市巡視或休息的時候，每每索閱當地報刊，藉此對於地方新聞言論得到瞭解」（註三〇五）。對國家要務，固必批交有關部門參照改正（同註三〇一）；對地方事件，亦必分別予以糾正，「即如去年（案：指民國五十五年）姜制軒遺棄案，以及最近一位九十幾歲老人因為被子孫遺棄而結果自殺案，蔣總統從報上獲悉後，就非常震怒！又如

前年（案：指民國五十四年）有一個警員干涉人身自由，另一個警員爲一個未滿月嬰孩未報戶口而誣指其爲姦生子之社會新聞，蔣總統看到後，就立即據以批以徹查嚴辦」（註三〇六）。

(三)

蔣公日理萬機，而對報刊新聞又如此注意，確非常人可及。其對報刊的處理方式，有略讀、有細閱，有自閱、有聽讀；必充分利用每一分鐘的時間，擇其要者，且將之剪存。如秦孝儀述曰：

領袖每日對報紙和新聞廣播的處理，是要經過看、讀、剪三個順序的。報紙廣播一到手，領袖先是觀其大要，對世界大事和國家要聞，首先獲得一個輪廓和統緒，然後才開始聽取每一則新聞一字一句的朗讀。等到下午，領袖還要自己再查閱一遍，對正在發展的重要新聞和值得參考的專論、社評，就親自動手剪截下來，夾在當天的日記裏（註三〇七）。

因爲蔣公太忙，雖然充分利用每一分鐘時間，仍感時間不夠，乃於閱報與聽讀之外，又盡量注意廣播與電視。如載：

（蔣）總統居恒只要有時間，也喜歡收聽廣播與電視；其中最使他老人家注意的節目，就是新聞報導與評論，以及對於一般民衆的教育節目等（註三〇八）。

對於海外僑胞，蔣公同樣關心，雖然委實難抽餘暇批閱所有的僑報僑刊等，「但也要求黨政負責部門，適時適切提出彙報」（註三〇九）。因此，蔣公「對每一件事的起因、演變、和趨向，皆能如示諸掌」（註三一〇）。

(四)

蔣公出於愛民與謀國之至誠，不但於華文報章素極留意，即對外文報章之言論，亦甚重視。如載：

(蔣)總統雖不直接批覽外文報刊，但對各國言論界對我所批評或建議，均透過黨政負責部門，得到全般的瞭解，在這一方面，蔣夫人對於總統的貢獻，更是厥功至偉（註三一—）。

案：「因爲一般人所未觸及的資料，夫人由於閱覽宏富，往往給予總統以匡補和助力」。所以「總統對於各種角度和尺度不同的外國輿論，在閱悉以後，均予以明銳的判斷」（註三一—二）。

因爲蔣公對外籍人士之言論，甚爲重視，所以在訓詞中，時常引用外人之語句，以激發我們警惕。如曰：

記得曾經有一位美國學者警告過我們說：「中山先生的信徙，不應該再躲在口袋裏，要爬到中山先生的肩頭上向外看一看了」。這一段話，實在值得我們警惕，也同樣值得我們激揚（註三一—三）。

但蔣公所瞭解的實際情況，總比外籍人士多得多，如曰：「現在國家培植的留學生，且很多的一去不返，他在國外學習到的新知識、新方法，也很少有意思要介紹到國內來」（註三一—四）。蔣公此種一針見血之直語，尤其值得我們警惕與激揚。蔣公雖然難得抽身出國訪問與考察，但對科學先進國家求新求進之精神，却知之很詳；且能道出其決新求進之主要動力、與基本原因。如曰：

你們到過外國的人一定知道：外國凡是一個部隊、學校、或一個機關，差不多都有研究費，而且研究費往往要佔到經常費三分之一，其他的費用，只佔三分之二。譬如他們的學校，無論那一科，都有專門研究的設備。……他們教職員先生在研究室的時間，比上課的時間還要多（註三一—五）。

即對鄰邦進步的情形、與進步的原因，亦常爲言之諄諄，而時爲期之殷殷。如民國五十八年（一九六九）十一月蔣公提示曰：

二十年來，我們眼見日本以一戰敗國家，刻苦自勵，發展成爲今日的「日本之挑戰」的局面；南韓以四五十年國破家亡之慘，由於其上下困心衡慮

，努力圖強，也成爲了今日一個新興的國家；即以六百平方里的彈丸之地的新加坡而言，十二年之間，亦已由其內部共黨滲透、官吏腐敗的困境，發展成爲了今日獨立自主的局面。當然日本、韓國以至新加坡……他們的成功，除了日本有其科學固有深厚基礎之外，其他皆是由於民族意識的激發（註三一六）。

綜上以觀，則知 蔣公不獨虛心而被動的樂於接受外人的建議，並尤精心而主動的樂於效法外人的長處。

蔣公超人的另一特點，使是自反性特高，檢討力特強；對任何外人的議論和批評，只作爲自反與檢討的參考，絕非一味全部接受。譬如一位美國學者以我們新建的科學館與飛機場接待室爲例，便說「台灣的一般建設都是零零碎碎，沒有完整統一的計劃」。又說「台灣許多建築物，只是加上琉璃瓦，就美其名曰傳統的中國式建築，而其內容，則零亂骯髒，無人管理」（註三一七）。對此，蔣公論之極中肯、極客觀。如曰：

他前一論點說——我們的建築缺乏完整統一的計劃，這是對的；但他的後一論點——只可說是一半對一半不對的，試問他所說的中國人用鋼筋水泥建造房屋，門窗採用鋁質及玻璃，並用膠塑油漆屋頂，就作爲是中國傳統建築物的一種說法，其意不就是說我們中國人所作所爲都是假造騙人的嗎？這就是他外國人對我們的重大誤解——實在我們所謂中國「傳統式建築」，只可指傳統的精神和模型而言，並不能單指建築材料爲其詬病的口實（註三一八）。

案：蔣公之此一解說，不但極中肯、極客觀，並且涵蘊着豐富的民族意識、與崇高的民族精神。

要是外國學者對我們批評得恰中其弊，雖然其詞語譏諷，蔣公亦絕不因語棄意、而樂於全部接受。譬如 蔣公引述一位英國學者陶納，對中國的率直評論如是：

中國的文官，知道西洋的政治學說，較多於西洋實際行政，而知道西洋又

多於中國；一個外國旅行者，在中國最感奇異的是他所認識的中國人，最不認識的國家，就是他們自己的中國……（註三一九）。

中國人相信紙上寫了字就是作了一件事，已成牢不可破的習慣。……在西洋人們有時只講辦法不講目的，中國人則只講目的不講辦法。中國人會議了又會議，起草了計劃以後，還得草計劃，報告以後，還得報告；紙張堆積如山，但全無辦事的力量和機械（註三二〇）。

對如此嚴厲的評論，蔣公不獨全部接受，並且因而指出中國人的積習與通病為：「專務空言」、「因循苟且」、「保守落伍」、「牽制掣肘」、「打圈旋磨」等；乃以此為改進之要與針砭之道（註三二一）。

(五)

為資建國之藉鏡起見，蔣公最注意研究各國現代史，所以蔣公的著述或訓詞中，不但古訓特多，亦常有新史；這些新史，多為實用方面者。如：

大家要知道，現在世界上凡是一等強國，他們的教育，未有不文武合一而並重兼修的，可以說他們教育的方法，與我們古人的方法完全相同。例如英、美、法、意、日所謂五大強國，無不如此，尤其是現代各新興國家，如德、如土，更無不首重武藝，不僅男子要習武，就是女子也要習武（註三二二）。

案：此乃取法列強當前之教育長處，恢復我國固有之教育方法；「矯正過去重文輕武的惡習」，「要從衰敗危亡之中復興我們的國家民族」（註三二三）。

要增進行政效率，必須倡行科學管理，要造成國父所謂的「萬能政府」（註三二四），尤須實施科學管理。所以蔣公對此亦曾過細研究。如曰：

現代行政學者，原都主張「科學管理，同樣可以應用於領導一支大軍，或者一個政府」。法國李阿泰將軍，就曾首先把科學的企業管理原則，應用於法國軍隊。美國國防部，多年來也就在科學管理精神，貫注於行政管理

方面，自麥納瑪拉開始，就更加是將企業管理運用到了國防管理，那就是所謂「構想——計劃——預算制度」。至於美國政府，則是早自十九世紀末期，就設置了專門機構，以研究改進行政、經濟、國防……事務的效率。……（註三二五）。

案：蔣公的用心是：「一個現代良好行政的政府，必須具有熱烈的為民服務的精神，和科學的企業管理的方法」。所以其特為昭示曰：「企業精神，即在提供最好的服務——包括服務的態度、效率的觀念，和一切為大眾利益設想的作為」（註三二六）。

為加強行政效率、建設台灣，俾能提早反攻復國起見，蔣公常常舉述世界各地之建設工程與建設成績，用以啓示國民，推行動員運動。茲節錄蔣公兩段訓詞於次：

台灣割讓日本，在甲午之戰以後，他經過二十年的經營，最初總以為台灣地瘠民貧，入不敷出，故曾考慮以一億法郎，售予法國。但到兒玉與後藤來任台灣總督與當政的時候，就認為台灣一經開發，不僅可以自足，而且可以成為他日本的寶藏。所以他招致了一批幹部，深入內地，調查考察，然後纔開始積極的建設，經過二十多年的苦幹，他們完成日月潭的水利工程，開闢了阿里山的天然森林。阿里山入山鐵道由山底升到海拔三千公尺的山巔，其計劃的遠大，工程的艱鉅，以當時的台灣情形，實在足以驚歎！看了這種偉大的工程，那我們川陝之間的棧道，西南各省的索橋，簡直是渺小得不足道了（註三二七）。

就如巴拿馬運河的開鑿，從一八七九年法人雷基布鼓其開蘇彝士運河的餘勇，倡議開鑿起，一直到一九一四年由美國政府手裏全部鑿通為止，中間就曾經歷時三十六年，特別是這條全長九十三公里的運河，有一半係經由一個人造湖而成，必須超越許多個山脊，建設七個水閘，其工程之艱鉅，遠非開鑿由平陸穿行的運河所可同日而語，這工程就是比橫斷埃及與西奈半

島之全長一百六十六公里的蘇彝士運河的開鑿，也困難得多。但是鑿通以後，他却能使美艦往來於兩沿海各港的航程，比之繞道麥哲倫海峽，要縮短一萬四千六百餘公里，那溝通太平洋與大西洋之間的效用，真不知道有多大了（註三二八）。

案：蔣公之世界近世史，相當精熟，益令敬佩其學養。而蔣公所以樂於詳述此蹟者，乃鼓勵國人不畏艱難而急起力行。復案：蔣公每思日人陸奧宗光所云，中日之間，「雖僅隔一衣帶水之兩國，竟出現一方代表西歐之文明，一方保守東方舊習套之異觀」。對此「冷嘲熱罵」，常覺「愧汗無地」（註三二九）。所以此時此地，惟有發奮圖強，才能雪耻稱雄。

結 論

蔣公之治事精神，實足令人敬佩，故於黃埔興校，練成勁旅，而獲得北伐成功，與抗戰勝利，不但達成國父遺囑（廢除不平等條約），並且超過國父遺囑（躋國家為世界五強之一）。而此偉大功業之建立，乃以豐厚之學業為基礎；換言之，蔣公創業之所以能夠特隆，乃因其治學之能夠極篤；並且功業既隆之後，而治學尤增其篤。學以為樂，學以為志；因涵泳充實而得其樂，因儲為國用而明其志。樂於學者，故能致其心於書；志於學者，故能得其道於書。所以蔣公固因事業之偉大而襯托其人格之偉大，尤因其道業之崇高而化成其性命之崇高。危難中能讀書如常，此可顯示其人格之偉大；病痛中亦讀書如常，此可象徵其性命之崇高。因積學於書而得其道，因得道於心而成其業；故曰蔣公之學、乃性命之學與經世之學，蔣公之道、乃修身之道與治國之道；惟其如此，故能成就漢文、漢武之偉業，得享周文、周武之高壽。此乃蔣公既以舊學滙注於新學之平衡境界，又以新學經緯於舊學之統一領域。亦惟如此，所以蔣公能於充實中求進步，於進步中求充實。無形之道業可以造成有形之功業，內在之學養可以形成外在之修養；吾人固應光大蔣公之道業與功業，尤應起效蔣公之學養與修養。

附 註

- 註一：蔣公曰：「孟子文章之好，異乎他書」（蔣經國撰：「我的父親」、一〇五頁。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所以 蔣公「對史記、孟子，都下過一番工夫」。自民國三年（一九一四）起，蔣公靜坐收心時所默念之條目，其一為孟子養氣章，其二為曾文正主靜箴。又謂其後到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每日晚課，默讀孟子養氣章，十五年來未曾或間，自覺於此略有領悟」（秦孝儀著：「蔣總統的思想、生活、操持」、一〇至一一頁。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
- 註二：蔣總統思想言論集、卷二九、頁五一：「報國與思想」（五十生日感言）、（中央文物供應社印行、民國五十五年十月出版）。
- 註三：蔣總統思想集、卷二九、頁五七：「先妣王太夫人百歲誕辰紀念文」。
- 第四：蔣總統思想言論集、卷二九、頁四一「先妣王太夫人事略」。
- 註五：毛思誠著：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卷一、第二編、頁一七。民國前十年（一九〇二）、蔣公十六歲（中央文物供應社印行、民國六十年十月再版）。
- 註六：同註五。
- 註七：蔣經國著：風雨中的寧靜、頁五至六、引 蔣公批註「荒漠甘泉」（民國六十一年二月、國防部印行）。
- 註八：董顯光著：蔣總統傳、第一章、頁一一（民國五十六年十月、中華大典編印會印）。
- 註九：同註八、初版弁言。
- 註一〇：同註九。
- 註一一：同註九。
- 註一二：同註八、頁一二。
- 註一三：同註四。
- 註一四：大學第一章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 註一五：陳啓天撰：哀悼總統 蔣公逝世辭（載「總統 蔣公哀思錄」、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民國六十四年四月出版）。
- 註一六：杜松柏著：蔣總統處變慎謀的歷史回顧（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民國六十二年八月出版）。

-)。
- 註一七：毛思誠著：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卷一、第一編、頁五、至第二編、頁二三。並參閱「蔣總統革命報國大事紀要」（中央日報社印「總統 蔣公哀思實錄」、民國六十四年五月出版）。
- 註一八：黎東方著：蔣公介石序傳、頁一五（聯經出版公司印行、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出版）。
- 註一九：孫詒撰：「仁湖撫談」、卷上（載國史館館刊、第一卷、第二號、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出版）。
- 註二〇：參閱「蔣總統革命報國大事紀要」。
- 註二一：論語、述而第七。
- 註二二：高明撰：蔣總統哲學思想與中華民族的道統（載「蔣總統思想研究」、頁一〇九至一二六，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再版）。
- 註二三：蔣總統集、第二冊、頁一四七六：「對從軍學生訓話」（中華學術院印行、民國六十三年十月四版）。
- 註二四：同註二三、並參閱蔣總統秘錄、第二冊、頁四三（二七三）至四四（二七四）。
- 註二五：同註一八、頁二一。
- 註二六：同註二三、並參閱蔣總統秘錄、第二冊、頁五〇（二八〇）至五三（二八三）。
- 註二七：參閱唐振楚撰：領袖的治學（載「永懷偉大的民族救星」、頁一四五至一五四，中央日報社編印、民國六十五年十月出版）。
- 註二八：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卷二、第七編、頁四八三至四八五，並參閱註二七。
- 註二九：王昇著：總統 蔣公行誼、第三章、頁二二（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民國六十五年三月三版）。
- 註三〇：同註二九。
- 註三一：蔣總統集、第一冊、頁一九六：「剿匪成敗與國家存亡」。
- 註三二：同註三一。
- 註三三：蔣總統集、第二冊、頁一三七四：「第三次南嶽軍事會議訓詞」。
- 註三四：蔣總統秘錄、第四冊、頁八七（八三九）至八九（八四一）。
- 註三五：蔣經國著：我們父親、頁一〇三（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民國六十五年三月九版）。
- 註三六：同註三五、頁八三。
- 註三五：一〇二頁。
- 註三六：蔣總統集、第一冊、頁八八：「大學之道、下篇」。

- 註三七：蔣公著：西安平安半月記、十二月十三日（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民國六十五年四月）。
- 註三八：參閱魏泰著：東軒筆錄、及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傳。
- 註三九：同註一七、第三編、頁三〇。
- 註四〇：同註一八、頁二四至二五。
- 註四一：同註二三
- 註四二：同註二三。
- 註四三：同註一九。
- 註四四：蔣總統言論選集、第二卷、頁一四三：「總理知難行易學說與陽明知行合一哲學之綜合研究」（中興山莊印、民國六十三年四月三版）。
- 註四五：董顯光著：蔣總統傳、第一章、頁六至七。
- 註四六：同註一七、第四編、頁三三至三四。
- 註四七：同註四六、頁三四（一九一二，蔣公二六歲）。
- 註四八：黎東方著：蔣介石序傳、頁三四。
- 註四九：同註一七、第六編、頁一一六。
- 註五〇：董顯光著：蔣總統傳、第八章、頁一一二。
- 註五一：同註五〇。
- 註五二：同註四八、頁二四七。
- 註五三：同註四八、頁二四七至二四八。
- 註五四：蔣總統思想言論集、卷二九、頁三五：「祭告總理文」。
- 註五五：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卷一、第六編、一〇四。
- 註五六：蔣總統思想言論集、卷四、頁一三三至一六三至一六三：「敵乎？友乎？」
- 註五七：蔣總統集、第一冊、頁一至五一。
- 註五八：蔣總統集、第一冊、頁五二至七九。
- 註五九：同註三五、頁一〇七。
- 註六〇：陳祖華撰：「效法蔣公讀書報國精神」（載民國六十四年四月八日，聯合報）。
- 註六一：蔣總統思想言論集、卷六、頁一至九二：「剿匪成敗與國家存亡」。
- 註六二：錢先蓮撰：「毛子水追往事：蔣公勤學，博學多聞」（載民國六十六年四月五日、民族晚報）。
- 註六三：總統蔣公哀思錄、第一篇、頁四四三至四四七、楚崧秋撰：「蔣總統平日對新聞輿論的重視」（總統蔣公哀思錄編印小組印行、民國六十四年十月出版）。

- 註六四：民國六十四年四月十六日，中國時報記者訪問顧維鈞特載：「歷史地位、千古不磨」。
- 註六五：毛思誠著：民國十五年以前之 蔣介石先生、卷一、第六編、頁一一六。
- 註六六：林大椿編著：總統 蔣公學術思想探原、壹、頁一九至二〇（正中書局印行、民國六十五年十月二版）。
- 註六七：秦孝儀編著：蔣總統嘉言錄、第一輯、科學篇、頁二一四（中央文物供應社印行、民國五十六年十月出版）。
- 註六八：蔣總統集、第一冊、頁一九六：「剿匪成敗與國家存亡」。
- 註六九：蔣總統集、第一冊、頁六一二：「進德修業與革命之途徑」。
- 註七〇：同註六九。
- 註七一：民國十五年以前之 蔣介石先生、卷一、第六編、頁一一九。
- 註七二：蔣總統言論選集、卷二、頁一四三至一六〇：「總理知難行易學說與陽明知行合一哲學之綜合研究」。
- 註七三：蔣總統言論選集、卷五、頁二一九至三〇四：「十九世紀以來亞洲的形勢和我們復國建國的要道」。
- 註七四：蔣總統言論選集、卷四、頁一三九至一九九：「革命教育的基礎」。
- 註七五：例如 蔣總統言論選集、卷六、頁一七六至一七九等。案：此為顯例之一是已、凡此隨處可見。
- 註七六：吳經熊著：蔣總統的精神生活、張其昀、序（華欣文化事業中心印行、民國六十五年五月再版）。
- 註七七：同註七六。
- 註七八：徐克昉選：「蔣公的德業修養」（載「領袖精神，萬古常新」、中央日報社編印、民國六十四年五月出版）。
- 註七九：張其昀撰：「總統 蔣公與文藝復興」（載「總統 蔣公哀思錄」、第一編、頁四一二至四一二至四一五）。
- 註八〇：同註七九。
- 註八一：同註七九。
- 註八二：熊凡談話：「平易中見偉人」（載「總統 蔣公哀思錄」、第一編、頁四九〇至四九二）。
- 註八三：蔣總統集、第二冊、頁一一八〇六：「如何紀念 國父誕辰」。
- 註八四：蔣總統集、第二冊、頁一七四四：「本年度工作檢討與明年努力的方向」。
- 註八五：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卷三、第八編、頁八七四。

- 註八六：蔣經國著：風雨中的寧靜、頁一四四。
- 註八七：錢穆撰：「蔣總統與中國文化」（載「總統 蔣公哀思錄」、第一篇、頁三六一至三六五）。
- 註八八：蔣總統言論選集、卷三、頁一七七：「考核人才的要領與原則」。
- 註八九：蔣總統思想言論集、卷三〇、頁八七：「歷代名將言行錄序」。
- 註九〇：蔣總統思想言論集、卷三〇、頁八五：「歷代名將傳序」。
- 註九一：蔣總統集、第二冊、頁一七八六：「對於幹部教育之回顧及今後剿匪戰術之檢討」。
- 註九二：同註七二。
- 註九三：蔣總統集、第一冊、頁九七九：「抗戰檢討與必勝要訣」（上）。
- 註九四：同註九三。
- 註九五：蔣總統集、第一冊、頁四九八：「一切政治制度要以建國大綱為基礎」。
- 註九六：總統 蔣公追思錄、頁三六七、芮晉撰述：「追憶總統 蔣公感人事蹟」（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民國六十五年三月五版）。
- 註九七：仁者畫象、頁二一九、彭歌撰：「含淚讀書」（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印行、民國六十四年四月初版）。
- 註九八：聖聖芬編著：蔣總統的生活與修養、頁一〇、載羅家倫撰：「忍天下之所不能忍、決常人之不敗決」（中央文物供應社印行，民國五十六年十月出版）。
- 註九九：蔣經國著：慈湖孝思、頁三七（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民國六十五年三月四版）。
- 註一〇〇：蔣總統集、第二冊、二〇六五頁：「發揚實踐精神和研究敵人思想方法」。
- 註一〇一：同註一〇〇。
- 註一〇二：同註一〇〇。
- 註一〇三：同註一〇〇。
- 註一〇四：同註六七、第一輯、科學篇、頁二二八。
- 註一〇五：蔣公著：中國之命運、第二章、第一節、頁一二至一五（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民國六十五年五月再版）。
- 註一〇六：范仲淹著：范文正公集、卷五、用天下心為心賦。
- 註一〇七：蔣經國：蔣院長言論選集、第一集、頁一四二：「開創欣欣向榮新氣象」（中央日報社印行、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四版）。
- 註一〇八：中央日報社編印：「永懷偉大的民族救星」、頁一三六、秦孝儀撰：「隨侍 蔣總統小知十錄」（民國六十五年十月出版）。

註一〇九：同註一〇八。

註一一〇：經國先生說：「現在要談到 總裁遺留下來的有形遺產，最寶貴的就是 總裁親自閱讀過的、批註過的、圈點過的許許多多的古書，以及現代的有關經濟，有關軍事、有關政治、有關管理各方面的書，這些書現在還放在 總裁的書房裏面，以後要送給黨史委員會來整理和保藏」（蔣院長言論選集、第六集、頁二九〇：「逆境堅定力，風雨生信心」、民國六十六年二月初版）。

註一一一：總統 蔣公哀思錄、第一編、頁四三四至四四〇、曹聖芬撰：「蔣總統的日常生活」。

註一一二：同註一一一。

註一一三：杜松柏著：蔣總統處變慎謀的歷史回顧（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民國六十二年八月出版）。

註一一四：董顯光著：蔣總統傳、第二十三章、頁三五六。

註一一五：蔣總統言論選集、卷五、頁一〇三至一五〇：「反攻復國心理建設的要旨與建設台灣為三民主義模範省的要領」。

註一一六：蔣總統集、第一冊、頁九二至一〇一：「中庸要旨」。

註一一七：蔣經國著：領袖 慈父 嚴師、頁五六（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民國六十六年三月三版）。

註一一八：曹聖芬撰：「蔣總統的日常生活」（載「總統 蔣公哀思錄、第一編、頁四三四至四四〇）。

註一一九：蔣總統集、第二冊、頁一四九一至一四九二：「對於知識青年從軍運動之指示」。

註一二〇：蔣總統秘錄、第五冊、頁一四二（一一六二）至一四三（一一六三）：「遺失日記及兩部兵書」（中央日報社印行、民國六十五年元月初版）。

註一二一：孫詒撰：「仁湖撫談」卷下、載國史館館刊、第一卷、第四號、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出版）。

註一二二：蔣總統思想言論集、卷三〇、頁八一至八二：「增補曾胡治兵語錄序」。

註一二三：毛思誠著：民國十五年以前之 蔣介石先生、卷一、第五編、頁四三。

註一二四：同註一二三、卷一、第六編、頁六五。

註一二五：同註一二三、卷一、第六編、頁九九。

註一二六：同註一二三、卷一、第六編、頁九五。

註一二七：蔣院長言論選集、第一集、頁一四至三一：「以民衆的公僕自任」。

註一二八：同註一二三、卷一、第六編、頁一八八。

註一二九：同註一二三、卷一、第六編、頁一八八。

註一三〇：同註一二三、卷一、第七編、頁五六五。

註一三一：同註一二三、卷二、第七編、頁七九二。

註一三二：論語、里仁第四。

註一三三：王昇著：總統 蔣公行誼、第三章、頁二二。

註一三四：同註二七。

註一三五：同註一三四。

註一三六：蔣公著：西安半月記、頁二六（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民國六十五年四月再版）。

註一三七：近代中國季刊第五期：「總統 蔣公逝世三週年紀念口述歷史座談會紀實」、頁六至七、愈國華發言（民國六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出版）。

註一三八：同註一三四。

註一三九：同註一三七、頁三五至三八、唐振楚發言。

註一四〇：同註一三九。

註一四一：陶希聖撰：「總裁在戰時的學術工作」（載民國六十四年四月十六日、聯合報）。

註一四二：同註一三七、頁七至九、秦孝儀發言。

註一四三：總統 蔣公哀思錄、第一編、頁一三一至一三七：「總統 蔣公治療休養及逝世經過報告」。

註一四四：同註一四三。

註一四五：論語、述而第七。

註一四六：同註一四二。

註一四七：同註一三七、頁二三、鄭堅發言。

註一四八：同註一四四。

註一四九：論語、雍也第六。

註一五〇：總統 蔣公哀思錄、第一編：「治喪報告」、頁一五四。並參閱蔣經國著：慈湖孝思、頁六。

註一五一：毛思誠著：民國十五年以前之 蔣介石先生、序。

註一五二：同註一五一、卷二、第七編、頁三九七。

註一五三：同註一五一、卷二、第七編、頁四八三至四八五。

註一五四：蔣總統言論選集、卷四、頁五七至一二二：「訓練的目的與訓練實施綱要」。

註一五五：劉朗撰：「蔣公對金融問題觀察深遠」（載民國六十四年四月十三日、經濟日報）。

註一五六：同註一五五。

註一五七：蔣總統集、第一冊、頁五六二：「為政與求學」（中華大典編印會印、民國六十三年十月

四版)。

註一五八：蔣總統集、第一冊、頁一〇三九：「五大建設之要義」。

註一五九：同註二七。

註一六〇：同註一五七。

註一六一：蔣總統集、第一冊、頁八〇至九二：「大學之道、上篇」。

註一六二：同註一六一。

註六三：蔣總統集、第一冊、頁九二至一〇一：「中庸要旨」。

註一六四：同註一一八。

註一六五：蔣總統集、第一冊、頁八五七至八六二：「為學辦事與做人的基本要道」。

註一六六：蔣總統集、第二冊、頁一二五一至一二五五：「參謀長會議閉幕訓詞」。

註一六七：蔣總統集、第一冊、頁八〇至一一七：「科學的學庸」。

註一六八：蔣總統言論選集、卷二、頁二一七至二四四：「科學的道理」。

註一六九：蔣總統集、第一冊、頁一：「國父遺教概要、第一講」。

註一七〇：同註一六九。

註一七一：同註一六三。

註一七二：蔣經國著：其介如石、頁一至五：「父親逝世兩週年紀念文」（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民國六十六年五月二版。）

註一七三：蔣總統言論選集、卷二、頁二四五至二九五：「科學的道理續論」。

註一七四：蔣總統集、第一冊、頁一九六至二二九：「剿匪成敗與國家存亡」。

註一七五：同註一七四。

註一七六：同註一七四。

註一七七：蔣經國著：風雨中的寧靜、頁一〇四。

註一七八：蔣總統集、第二冊、頁一七七二至一七七七：「幹部訓練的要旨及幹部自反自修的要領」。

註一七九：蔣總統言論選集、卷三、頁二七一至三〇八：「革命幹部的工作方法」。

註一八〇：蔣總統集、第一冊、頁一一〇五至一一〇八：「今後教育的基本方針」。

註一八一：荀子、勸學篇。

註一八二：同註一七七。

註一八三：蔣總統集、第一冊、頁一一二〇至一一三七：「訓練的目的與訓練實施綱要」。

註一八四：同註一八三。

- 註一八五：蔣總統集、第一冊、頁四五四至四五九：「革命黨員辦事的精神與方法」。
- 註一八六：蔣總統集、第一冊、頁四五四至四五七：「軍事教育之要旨與軍紀之根源」。
- 註一八七：同註一七九。
- 註一八八：秦孝儀編著：蔣總統嘉言錄、第一輯、科學篇、頁二三三。
- 註一八九：邵元冲撰：「總理學記」（載「革命先烈先進闡揚 國父思想論文集」、第一冊、頁三二，黨史會印行、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出版）。
- 註一九〇：同註一七三。
- 註一九一：同註一七四。
- 註一九二：同註一六七。
- 註一九三：同註一六八。
- 註一九四：蔣總統言論選集、卷三、頁二一五至二四二：「行政革新的要旨」。
- 註一九五：同註一七四。
- 註一九六：中央日報社編印：「總統 蔣公哀思實錄」、頁一七七至一七八載顧祝同撰：「追念我們的總統 蔣公」（民國六十四年五月出版）。
- 註一九七：同註一九四。
- 註一九八：論語、子罕第九。
- 註一九九：孟子、梁惠王篇上。
- 註二〇〇：同註一九〇。
- 註二〇一：蔣總統言論選集、卷二、頁一四三至一五九：「總理知難行易學說與陽明知行合一哲學之綜合研究」。
- 註二〇二：同註二〇一。
- 註二〇三：中央日報社編印：「永懷偉大的民族救星」、頁一五九至一六五、王雲五撰：「我怎樣受知於總統 蔣公」（民國六十五年十月出版）。
- 註二〇四：同註二〇三、頁四二至四五、羅家倫撰：「忍天下之所不能忍，決常人之所不敢決」。
- 註二〇五：蔣總統集、第二冊、頁二〇〇一至二〇〇三：「今後軍事教育中的幾項中心課題」。
- 註二〇六：秦孝儀著：蔣總統的思想、生活、操持、頁一〇（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民國六十五年三月三版）。
- 註二〇七：同註一九六、頁一七九至一八二、錢穆撰：「屢蒙 總統召見之回憶」。
- 註二〇八：蔣總統集、第一冊、頁一七一至一八三：「中國經濟學說」。
- 註二〇九：同註二〇八。

註二一〇：同註二〇〇、頁五一。

註二一一：同註二一〇。

註二一二：蔣總統言論選集、卷二、頁一六一至二一六：「解決共產主義思想與方法的根本問題」。

註二一三：同註二一二。

註二一四：同註二〇八。

註二一五：蔣總統思想言論集、卷三〇、頁八四：「馬漢海軍戰略論序」。

註二一六：總統 蔣公哀思錄、頁一八九至二〇〇、載張群撰：「我們對於總統 蔣公言行的體認」
(黎明文化事公司印行、民國六十四年四月出版)。

註二一七：同註二〇〇。

註二一八：蔣經國著：我的父親、頁八三。

註二一九：同註二〇〇。

註二二〇：蔣總統集、第一冊、頁一〇二五至一〇二七：「後方勤務人員工作要旨」。

註二二一：秦孝儀撰：「總統的修持和天趣」(載民國五十五年五月二十八、中央星期雜誌)。

註二二二：同註一六四。

註二二三：總統 蔣公哀思錄、第一編、頁四四七至四五〇載馬星野撰：「蔣介石先生會見記」。

註二二四：中央日報社編印：蔣院長言論選集、第六集、頁二九〇至三〇八：「逆境堅定力，風雨生信心」(民國六十六年二月初版)。

註二二五：同註二〇六、頁九。並參閱註一六四。

註二二六：同註二〇〇。

註二二七：蔣經國著：領袖 慈父 嚴師、頁二。

註二二八：同註二一八、頁八五、頁六、及頁一〇五。

註二二九：同註二一八、頁八一、及頁九八。

註二三〇：蔣總統集、第三冊、頁二七五三：「手令一則」。

註二三一：蔣總統言論選集、卷一、頁二二九至二六三：「三民主義的本質」。

註二三二：同註八七。

註二三三：同註一一八。

註二三四：蔣總統集、第一冊、頁四三四至四三七：「革命黨員要做強毅的『無名英雄』」。

註二三六：同註一四一。

註二三七：陶希聖著：潮流與點滴、頁二〇一至二一二：「關於中國之命運」(傳記文學社印行、民國五十九年九月出版)。

- 註二三八：蔣總統言論選集、卷二、頁一四三至一五九：「總理知難行易學說與陽明知行合哲學之綜合研究」。
- 註二三九：蔣總統言論選集、卷五、頁一〇三至一五〇：「反攻復國心理建設的要旨與建設台灣為三民主義模範省的要領」。
- 註二四〇：蔣公著：蘇俄在中國、第一編、第二章、第七節（中央文物供應社印行、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版）。
- 註二四一：蘇俄在中國、第一篇、第三章、第三十六節。
- 註二四二：蔣總統言論選集、卷二、頁一六一至二一六：「解決共產主義思想與方法的根本問題」。
- 註二四三：同註二四二。
- 註二四四：同註二四二。
- 註二四五：同註二四二。
- 註二四六：同註二四二。
- 註二四七：同註二四二。
- 註二四八：同註二四二。
- 註二四九：同註二四二。
- 註二五〇：同註二四二。
- 註二五一：同註二四二。
- 註二五二：同註二三一。
- 註二五三：蔣總統言論選集、卷四、頁一三九至一九九：「革命教育的基礎」。
- 註二五四：同註七。
- 註二五五：同註二三八。
- 註二五六：同註二三八。
- 註二五七：蔣總統集、第一冊、頁五八七至五九五：「中國的立國精神」。
- 註二五八：蔣總統言論選集、卷二、頁一至一六：「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
- 註二五九：同註二五八。
- 註二六〇：林桂圃著：國父遺教與蔣總統、第一篇：「導言」（幼獅書店印行、民國五十四年三月出版）。
- 註二六一同註二六〇。
- 註二六二：此種情形，在四大冊「蔣總統集」中（連同「最近言論集」）隨處可見，最顯著者莫過於「中國經學說」、四：「民生主義的經濟的道理」（載蔣總統集、第一冊、頁一七九至一八

二)。

註二六三：蔣經國著：領袖 慈父 嚴師、頁一二。

註二六四：蔣公著：中國之命運、第四章、第三節、頁八五動

註二六五：蔣總統集、第一冊、頁五四：「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第一章、第一節。

註二六六：蔣總統集、第一冊、頁一至五一。

註二六七：蔣總統集、第一冊、頁一〇三九至一〇四〇：「五大建設之要義」。

註二六八：同註二六二。

註二六九：同註二六二。

註二七〇：同註二四二。

註二七一：蔣總統集、第一冊、頁一七一至一八三：「中國經濟學說」。

註二七二：蔣總統集、第一冊、頁六一二至六一四：「進德修業與革命之途徑」。

註二七三：蔣總統集、第一冊、頁一〇二至一〇九：「政治的道理」。

註二七四：同註二七三。

註二七五：同註二七三。

註二七六：同註二五七。

註二七七：同註二三一。

註二七八：蔣總統言論選集、卷三、頁一一九至一五五：「組織的原理和功效」。

註二七九：同註二四二。

註二八〇：同註二四二。

註二八一：同註二四二。

註二八二：同註二四二。

註二八三：同註二四二。

註二八四：同註二四二。

註二八五：蔣總統言論選集、卷五、頁一五一至二一八：「復國建國的方向和實踐」。

註二八六：同註一四一。

註二八七：同註二八六。

註二八八：同註二八六。

註二八九：參見湯承業著：國父革命宣傳志略、上冊、頁一至七三、第一章各節（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印行、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出版）。

註二九〇：董顯光著：蔣總統傳、第三章、頁三四述曰：「蔣總統深知衝鋒性的進攻極關重大，乃

以敢死隊百人於夜間兩點往攻巡撫衙門，蔣總統則自任衝鋒隊指揮。雖然有壓倒多數的滿清軍隊駐扎杭州城內，但進攻者的勇敢，卒使局勢轉移。這些革命黨人各懷有炸彈，旋即迫使巡撫衙門的衛兵潰逃，並縱火焚燒衙門，巡撫增韜越後牆逃去。黎明，杭州遂光復」。

註二九一：總統 蔣公哀思錄、第一編、頁四四三至四四七，楚崧秋撰：「蔣總統平日對新聞輿論的重視」。

註二九二：同註二九〇、頁三五

註二九三：同註二八九、第一章、第四節。

註二九四：同註二九一。

註二九五：同註二九一。

註二九六：蔣總統言論選集、卷二、頁一六一至二一六：「解決共產主義思想與方法的根本問題」

註二九七：同註一四一。

註二九八：同註二九七。

註二九九：同註二九七。

註三〇〇：同註二二一。

註二〇一：吳澍碧訪馬星野：「總統 蔣公與政大新聞系」（載「政大校友」、第三一期、頁九至一三、民國六十四年五月出版）。

註三〇二：同註二九一

註三〇三：同註二九一。

註三〇四：同註一〇八。

註三〇五：同註二九一。

註三〇六：同註三〇四。

註三〇七：同註二〇六。

註三〇八：同註二九一。

註三〇九：同註二九一。

註三一〇：同註三〇〇。

註三一〇：同註二九一。

註三一〇：同註二九一。

註三一三：蔣總統言論選集、卷五、頁二一九至三〇四：「十九世紀以來亞洲的形勢和我們復國建國的要道」。

註三一四：同註三一三。

- 註三一五：蔣總統言論選集、卷二、頁二一七至二四四：「科學的道理」。
- 註三一六：蔣總統言論選集、卷三、頁二七一至三〇八：「革命幹部的工作方法」。
- 註三一七：蔣總統言論選集、卷三、頁二一五至二四二：「行政革新的要旨」。
- 註三一八：同註三一七。
- 註三一九：同註三一三。
- 註三二〇：同註三一三。
- 註三二一：同註三一三。
- 註三二二：蔣總統言論選集、卷四、頁一至一三：「救國必須實施文武合一術德兼修之教育」。
- 註三二三：同註三二二。
- 註三二四：民權主義、第六講。
- 註三二五：蔣總統言論選集、卷二、頁二四五至二九五：「科學的道理續編」。
- 註三二六：同註三二五。
- 註三二七：蔣總統集、第二冊、頁一八一八至一八二二：「對推行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的提示」。
- 註三二八：同註三二七。
- 註三二九：同註三二三。